

ISSN 1993-6516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 傳播管理學刊

-----  
第 20 卷 第 2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

### 【研究論文】

普欽政府對電視媒體的管控：愛國主義宣傳  
的強化

邱瑞惠

從盟友到對手：柯文哲參選市長的媒體建構  
之比較研究(2014 與 2018)

陳郁宜

### 【傳播趨勢】

後真相，布里班克人(Buribunks)和對信息性  
存在的解釋

Kieran Tranter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出版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 傳播管理學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出版 第 20 卷 第 2 期

---

發行者／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編輯委員會／王智立(銘傳大學)、梁定澎(中山大學)、陳尚永(輔仁大學)、  
陳耀竹(銘傳大學)、陳偉之(玄奘大學)、黃葳威(政治大學)、  
楊志弘(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郭良文(交通大學)、  
蔡敦浩(中山大學)、鄭自隆(政治大學)(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主編／倪炎元

執行編輯／吳毓傑、張舒斐、張桂綸、陳佳慧、陳柏宇、劉忠陽、賴玉  
釵(依姓氏筆劃排序)

執行秘書／胡巧玲

電話／(02)2882-4564 轉 2413

傳真／(02)2881-8675

本期售價／新台幣 250 元

---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目 錄

## 【研究論文】

- 普欽政府對電視媒體的管控：愛國主義宣傳的強化 邱瑞惠 1
- 從盟友到對手：柯文哲參選市長的媒體建構之比較研究(2014 與 2018) 陳郁宜 32

## 【傳播趨勢】

- 後真相，布里班克人(Buribunks)和對信息性存在的解釋 Kieran Tranter 49

# 普欽政府對電視媒體的管控：愛國主義宣傳的強化

邱瑞惠<sup>1</sup>

## 《摘要》

普欽在位以來，培養國民的愛國主義意識便為一重要治國方針。本文檢視俄羅斯愛國主義政策，從普欽個人公開談話，及相關計畫預算的逐年升高，可看出政府對愛國主義宣傳的重視；由於俄羅斯主要電視所有權，大多由政府及其親近或附屬組織所掌控，因此使克里姆林宮得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在電視台節目中，鞏固愛國主義的方式，常使用反西方國家的言論，塑造敵對的「他者」；並呈現出俄羅斯是勇敢大國，於國內外對抗西方勢力且終將得勝。

關鍵詞：普欽、電視、所有權、愛國主義、宣傳

---

<sup>1</sup> 銘傳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給予本文的審查意見和寶貴建議，作者獲益良多。

## 壹、前言

2000 年普欽(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1952-)上任後，曾公開提到解體後十年對俄羅斯來說是一段軟弱和屈辱的時期。普欽認為西方對俄民主和人權的關注，不過是傷害俄羅斯、阻礙其經濟和地緣政治再度興起的藉口。他對西方和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的憤怒經常透過媒體表達，激起民眾的共鳴。

從媒體研究的角度來看，過去傳統的媒體制度理論將媒體運作方式分為自由主義理論 (the Libertarian)、社會責任論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威權理論 (the Authoritarian theory)、蘇聯共產主義理論 (the Soviet Communist theory) (Siebert, F.,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63)，而學者稱俄羅斯的媒體制度是新威權主義媒體制度 (Neo-Authoritarian Media System) (Rogerson, K., 1997; Umland, A., 2012; Becker, J., 2014)。這種體制與過去的威權體制或蘇聯共產主義體制有共同點，但並不完全相同。

新威權主義媒體體制的特點包括：領導人了解民主和選舉是現代世界唯一可以接受的合法政治來源，也深知在維護政治權力的工具上，直接施行暴力的代價日益增加。政府開放媒體一些反對言論的空間，以換取國內外更大的合法性。對於期望規避民主不確定性風險的情況，並能獲取選舉合法性成果政府來說，在削弱公民做出明智抉擇的能力上，大眾傳媒是最重要的工具；而在各種媒介中，會對影響力最大的傳播形式（通常是電視）進行控制(Becker, J., 2014)。

與其他重要機構一樣，新威權主義媒體制度控制媒體的機制往往比蘇聯或傳統威權體制更為微妙。它對政府所有權制定規則並擴大勢力範圍，旨在確保消除電視媒體異議勢力的增長，就算是私有媒體也通常與政治領導層有著緊密利益關係。新威權體制下的記者也常面臨著批評當權政府的障礙。主管經常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訴他們界限在哪裡，如果他們越過了可以接受的異議界限，他們可能會被解雇。記者們意識到批評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從而促進自我審查(Becker, J., 2014)。

普欽上任時，了解俄羅斯人民對過去作為世界大國的自豪感，以及想要恢復這種地位的渴望；為了達成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及對西方世界的抵制，本世紀初以來，俄羅斯政府制定了連續性的愛國主義政策，幾乎涉及從聯邦到地方各級的所有國家機構，並深入到教育系統。它要求國家機構和傳播媒體推廣傳統價值觀，在各種傳播媒體中，尤其重視電視。

對於愛國主義思想的相關詮釋，Primoratz 定義愛國主義為：「對某一國家及其政體的熱愛，部分原因在於它是自己的祖國所激發出來的情感，表現形式為對祖國和同胞福祉的特別關切。」(Primoratz, I., 2002)他認為並非所有類型和程度的愛國主義都是道德的，愛國主義只有在適度而非激進的情況下才在道德上是被允許的。適度的愛國主義是非排他性的，對其他國家及其居民也能給予關注，且對於自己國家並非盲目支持，國家是祖國的事實還不夠，適度的愛國主義者還希望國家能夠滿足道德和文化要求，才值得支持和奉獻。

另外，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常有重疊之處，關於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討論相當豐富。有學者將兩者區分，認為愛國主義涉及對國家和國民的積極情緒，並且更加與世界價值體系相容，而民族主義是軍國主義和排他性的(Мартынов, M., 2009)。其他關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文獻中，則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各自做二元性區分，Kohn 曾提出公民與族群民族主義之間區別最有影響力的論述：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具有包容性和寬容性，而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具有歧視性和強制性(Kohn, H., 2005)；Schatz 等學者則對愛國主義加以區分：建設性的愛國主義(constructive patriotism)是至關重要與和平的，而盲目的愛國主義(blind patriotism)則是沙文主義和好戰的(Schatz, T., Staub, E. & Lavine, H., 1999)。

德國學者 Mummendey 比較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點明其中最大區別是在對「他者」的態度。雖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同樣都對國家懷有熱愛和強烈認同感，但民族主義是透過排斥他者，貶低敵對民族價值，來強化自身內部的團結和國家認同；而愛國主義則是將來自國家內部的缺陷，像是貪腐現象、政治上的專制、貧富差距大等，看作是需改進的「他者」(Mummendey, A., Klink, A., & Brown, R., 2001)。

就愛國主義而言，學者基本認同適度和有建設性的愛國主義表現，對內將國內問題視為需改進的「他者」，可以促進國家進步，如此對外關係也能促進和諧；同時愛國主義是一種個人的選擇，因此不適合強制性地推行愛國主義，或是利用來打壓社會異議份子(Primoratz, I., 2002)。

綜合上述，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首先是普欽政府為推行愛國主義思想，如何制定愛國主義政策？推行成效如何？

再者，當權者在推行愛國主義思想上，大眾傳媒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電視

從蘇聯時代至今，仍為影響力最大的媒體。國家的政治經濟優勢階級常於特定社會環境下，利用電視媒體對民眾進行社會控制（林麗雲，2006）。而控制的方法除了透過政策法令來規範和約束電視媒體外，最根本有效的方式，則是透過對電視媒體所有權的控制；一方面可用國營形式直接傳達國家意志，另一方面則可透過政府親信的私人資本，以擁有股權的方式，影響媒體（王振寰，1992；林麗雲，2006）。本文也分析目前俄羅斯最重要的電視頻道有哪些？哪些是由政府及其親近財團所控制？獨立電視台能否發揮作用？

此外，為了回答實際上愛國主義思想的呈現，必須分析俄羅斯主要電視頻道的內容。在獲取公共事務的消息來源上，電視一直是民眾最主要管道；而值得分析的內容，除了收視率相當高的新聞時事評論和談話性節目之外，軟性的戲劇節目又如何注入愛國主義思想？

最後，本文也將從上述愛國主義的概念來思考，俄羅斯電視媒體日益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是否為一種強化對「他者」的排斥和貶低？而這種方式雖能增強國家凝聚力，但是否也會造成對西方的盲目抵制，反而形成敵視性的民族主義？

## 貳、俄羅斯政府愛國主義政策

### 一、官方愛國主義思想的制定和內涵

1998 年葉爾欽以總統令宣布成立跨媒體國家壟斷集團《全俄羅斯國家廣播電視公司》(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елевизионная и Радиовещательная Компания, 縮寫為 ВГТРК)，接著 1999 年《俄羅斯出版、廣播電視和大眾傳媒部》(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ы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России, 縮寫為 ФАПМК)成立，俄羅斯政府便開始加強對電視的控制，以便鞏固國家民族的觀念。普欽 2000 年勝選後，寡頭媒體帝國在政府整肅下——潰敗，面對意識形態上嶄新的、有力的政府，合作和忠誠是電視領域採取的相應路線。2005 年普欽稱蘇聯解體是 20 世紀最大的災難，因為解體後控制言論的寡頭集團只顧己身利益，不關心國家利益；俄羅斯經濟急遽衰退，傳統的社會價值和道德體系也隨之崩壞(ИА Regnum, 2005)。

因此，從普欽執政起，便立定重要治國方針為培養俄羅斯國民的愛國意識，官方的愛國主義定義，是在 2003 年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公民的愛國主義教育概

念》(Концепция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將愛國主義概念予以釐清。其中定義了何謂「愛國」—「對國家的愛，對祖國的奉獻，為國家利益服務，保衛祖國，在必要時不惜為國家犧牲性命...」。在個人層次上，強調愛國是個人品格的重要成分，這主要體現在公民參與和對祖國積極的「無私奉獻」上。在社會發展的層面上，愛國主義被定義為「任何民族和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鞏固基礎」(Мацевская, Г., 2016)。

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轉變，愛國主義作為國家理念的重要性逐年增強，這可從普欽的公開談話中得知。2000 年初期，政治和經濟穩定是國家發展要點（尤其是經濟）。普欽在 2003 年國情咨文中曾提到「俄羅斯必須成為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國家、一個財產權受到安全保護的國家.....最重要的是確保經濟高速增長。國家前途取決於此」(Путин, В., 2003)。而在 2004 年時他說：「俄羅斯經濟必須在世界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因此首先必須積極發展全國市場。」(Путин, В., 2004)。

普欽第二任期起逐漸加重愛國意識的地位；2007 年在國情咨文中提到，政治及經濟穩定很重要，但和兩者一樣重要的是人民思維的統一和凝聚道德意識(Kremlin.ru, 2007)；接著在 2012 年國情咨文裡，他更明確地提到愛國意識的重要，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感和愛國心是國家治理的堅定基礎；而媒體應以社會利益為首要目標，並以高尚的道德標準為方針(Путин, В., 2012)。普欽在 2014 年底並正式批准《俄羅斯國家文化政策基礎》(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的文件，提出從公民、民族、國家、世界四個方面強化國家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將國家文化政策與國家認同和愛國精神連結(Kremlin.ru, 2014)。

進而普欽 2016 年時表示，俄羅斯的國家思想就是愛國主義，其他思想都不用考慮。他強調：「除愛國主義之外，我們沒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統一思想。」還說明愛國主義並非某種意識形態，也不和政黨活動有關，而是共同的統一原則(奧加廖沃，2016)。從普欽執政至今，可以看出愛國主義思想在 2000 年時是治國理念之一，之後便逐漸轉變為國家主要的思想和發展方針。

對於官方愛國主義思想的內涵，學者研究普欽公開談話，發現其中幾個重要脈絡，其中之一是強調來自外部的威脅。例如 2012 年的談話：

「歷史經驗表明，我們的文化自覺、精神和道德價值觀，以及價值準則，都是競爭激烈的場域。有時，它會受到公開的資訊敵意—我不想說侵略，但肯定是



敵意—以及精心策劃的宣傳攻擊。……企圖影響各國人民的世界觀、使他們服從自己意願的願望、將某些價值和信仰制度強加於他們……我們知道，民族、歷史和道德意識的扭曲是如何導致整個國家的災難、國家的軟弱和最終滅亡、主權的喪失和自相殘殺的戰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未來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而這個基礎就是愛國主義」(Yasaveev, I., 2017)。

與此同時，其言論並未明確指出究竟是誰在威脅俄羅斯，敵人被賦予了沉默模糊的樣貌。另外在官方言論中，還強調了「國防」的概念。其中強調「保護國家」、「保護祖國利益」、「保衛祖國主權」和「強大獨立的俄羅斯聯邦」的優先事項。俄羅斯官方並稱愛國主義思想為所有俄羅斯青年所具有的普遍特徵；例如普欽在 2013 年 8 月 2 日的談話，「我相信我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是國家的愛國者」(Yasaveev, I., 2017)。

## 二、愛國主義相關措施及成效

在愛國主義措施上，自 2000 年以來，愛國政策便透過俄羅斯聯邦政府每五年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聯邦專案實施。它們通常被稱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聯邦專案(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2001 年，普欽制定了《2001 年—2005 年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聯邦專案(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01-2005 Годы)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01-2005 Годы)( Коммерсант, 2001)，專案中關於大眾傳媒的部分，列出經費用於支持參與宣傳愛國主義的傳媒，其工作包括：制定加強電視和廣播愛國主義方向的方案、播送週期和具體建議；為確保歷史和時事呈現的客觀性來制定節目內容；積極抵制祖國歷史事實遭歪曲和篡改；……在電視和廣播節目中制訂對公民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持續性主題，促使科學家、政治家和公眾人物、文化藝術工作者、教師、教育工作者、退伍軍人、軍人和勞工等代表討論愛國主義教育的問題；通過建立愛國主義主題的年度作品比賽，振興記者、作家、電影製片人的創造潛力……。

之後俄政府分別階段性地在 2004 年制定《2006 年—2010 年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2010 年制定《2011 年—2015 年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0)，2016 年 1 月 2 日，俄總理梅德維傑夫(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也簽署決議，批准《2016年—2020年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015)，增加更多項的傳媒活動，並且擴大經費的投入。和過去一樣，計劃除了保持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方針，也向不同社會階層和年齡族群宣傳愛國意識，旨在創造條件加強社會團結，以保證俄穩定發展和國家安全（胡曉光，2016）。

從經費支出可證明，愛國主義教育現在於政府事務中佔據優先位置，2016-2020年聯邦專案比起2011-2015年專案的預算增加超過三倍至17億盧布。聯邦專案的主要執行者是國防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俄羅斯聯邦民防、緊急情況及消除自然災害後果部，簡稱為緊急情況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и по Делах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Обороны,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 Ситуациям и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Стихийных Бедствий, 俄文簡稱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о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 Ситуациям – МЧС России)、文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教育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和俄羅斯聯邦新聞出版與傳媒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ы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Goode, P., 2016)，各部門在歷年計畫的支出如表1：

表1 2001-2020年俄羅斯愛國教育聯邦專案支出（計算單位：百萬盧布）

政府單位	2001-2005年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2016-2020年
國防部	9.73	27.55	43.3	204.6
緊急情況部	0.6	35.5	27.7	200
文化部	32.45	82.2	140.35	519.1
教育部	46.11	129.25	140.1	699.1
俄羅斯聯邦新聞出版與傳媒署	23.5	17.5	138.5	123.4

資料來源：Goode, P. (2016, July) Everyday Patriotism and Putin's Foreign Policy,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432*, p.7. <<http://www.ponarseurasia.org/memo/everyday-patriotism-and-putins-foreign-policy>>.

普欽於 2012 年 10 月 20 日簽署《完善國家愛國主義教育政策》總統令(Указ 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Област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命令在俄聯邦總統辦公廳內部成立俄羅斯聯邦社會專案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Проектам, 縮寫為 УОП)，其職掌範圍包括收集和統整全國大眾傳媒對國家愛國主義教育政策的立場，並向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呈交關於如何與大眾傳媒合作、如何在資訊上支援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舉辦之活動的提議。俄羅斯將愛國主義教育的政策置於總統辦公室領導之下，直接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

另外，四個愛國主義教育聯邦專案的原則一致，但每個專案隨著政治和意識形態環境變化有不同重點(Khodzhaeva, E., & Meyer, I., 2017)。目前進行中的第四專案(2016-2020)突顯出保衛意識，強調國防和軍事化的重要。其主要預期成果之一是：「確保青年形成保衛祖國的道德、心理和身體上的準備、對憲法的忠誠、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軍事義務、高度的公民責任」。學者認為前兩個專案重點主要在闡述俄羅斯作為獨立和強大國家的新概念，第三和第四專案則主要集中在恢復蘇聯的愛國經驗，加強保衛國家的論述。

經過多年的政策實施，從人民愛國意識的調查結果來看似乎頗有成效。國營機構《全俄輿論調查中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縮寫為 ВЦИОМ, 英文縮寫 VTСИОМ)在 2016 年 6 月 18 及 19 日所做的調查顯示，俄羅斯人愛國比例相當高，65%的俄羅斯人在發生戰爭時，準備送親人去前線保衛家園，且高達 80%的公民認為自己是愛國主義者(Mresearcher, 2016)。《社會輿論基金會》(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縮寫為 ФОМ)在 2017 和 2018 年的愛國主義調查也是呈現相同結果(FOM, 2017)。根據《全俄輿論調查中心》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自稱為愛國者的俄羅斯人的比例為 92%，是 18 年來的最高人數(Russia Today, 2018)。在恢復蘇聯愛國經驗的宣傳上，特別重視蘇聯在二戰中的勝利相關活動。2012 年之後，每年 5 月 9 日紀念勝利日的閱兵式規模都在擴大，2015 年紀念勝利日 70 周年的閱兵式上，參加閱兵式的士兵人數達到創紀錄的 1.6 萬人(Sharkov, D., 2017)。

俄羅斯學者別斯帕洛娃(Татьяна Беспалова)認為，俄羅斯重視愛國主義宣揚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抗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對俄國的孤立。她認為，美國和它的西方夥伴企圖孤立俄羅斯，並在經濟上削弱俄國；在政治上和精神上，

形成俄國的負面形象，指責它吞併克里米亞<sup>2</sup>、對「分離主義」的支持，甚至直接侵略烏克蘭東部。事實上，它是為俄羅斯與俄羅斯民族創造一個世界公敵的形象。這一切伴隨著煽動「恐俄症」(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製造對俄羅斯民族的仇恨，貶低俄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Беспалова, Т., 2011)。在類似的思維下，俄羅斯民眾對西方自然沒有好感，也因此凝聚了內部的團結意識。

### 參、俄羅斯電視媒介體系之分析

普欽執政時期，重要電視媒體掌控在國家手中，因此常淪為國家意識形態宣傳管道；獨立的電視台則被邊緣化，以致於在監督政府、並在政策制定上很難發揮作用。俄羅斯電視體系回復到政府控制之下，如同俄羅斯傳播學者札蘇爾斯基(Засурский, Я., 2005)和卡諾夫臣卡(Коновченко, С., 2001)對俄羅斯媒體模式的界定，電視體系已成為「政府的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國家成為電視市場壓倒性的最大持有者，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厭惡及愛國意識的主張，成為電視台的主流思想。

俄羅斯具有影響力的電視頻道由幾大勢力所掌控：俄羅斯政府、《國家媒體集團》(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едиа Группы)、《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 Холдинг)。這些由政府及其親近或附屬組織掌控重要頻道，使克里姆林宮得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另外有相對獨立的 *Euronews* (俄政府持股 2.29%)、*RBC*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изнес-Телеканал, РБК)，以及獨立的電視台 *Rain TV*(Дождь)。茲分述如下<sup>3</sup>：

#### 一、政府及其親近或附屬組織所掌控的電視頻道

##### (一)、俄羅斯政府

##### 1、《第一頻道》(Первый Канал)

第一大電視頻道，從蘇聯時代存在至今，在 1995 年改建成《公共俄羅斯電

---

<sup>2</sup> 2013 年 11 月，烏克蘭總統宣布暫停簽署與歐盟的經濟合作協定，轉而加入俄羅斯主導的關稅同盟，此舉引發烏克蘭親歐盟的示威運動。2014 年 2 月底，俄羅斯藉此開始採取行動，對烏克蘭南部半島克里米亞進行軍事干預。克里米亞議會 3 月提出脫離烏克蘭並重新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公投提案，公投的結果壓倒性通過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獨立，並立即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公投結束後，克里米亞宣布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同時議會正式向俄羅斯提出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俄羅斯並在 3 月 22 日經國會表決通過，由總統普欽簽署生效，讓克里米亞正式加入俄羅斯。但國際社會不承認投票結果，聲明公投違反國際法，同時為了反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兼併行為，美國等國家組成聯盟對其施加政治和經濟制裁。

<sup>3</sup> 電視頻道所有權整理自各電視台公開網頁。

視頻道》(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簡稱 OPT), 原由別列佐夫斯基(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持有大部分股份, 2001 年被迫賣掉, 2002 年恢復歷史名稱《第一頻道》。根據網站公開資訊, 《第一頻道》51%的股份來自政府機構, 由代表國家單位的聯邦國家財產管理局、俄通社-塔斯社和奧斯塔基諾電視技術中心所持有。49%的股份來自於私人企業, 由富豪阿布拉莫維奇(Роман Абрамович)和《國家媒體集團》的旗下公司所掌控。

第一頻道是俄羅斯最具影響力的電視頻道, 境內覆蓋率近 100%。總統親自任命的電視台執行長康斯坦丁·恩斯特(Константин Эрнст)每週固定和克里姆林宮官員對電視台編輯政策進行討論。

## 2、《俄羅斯 1 頻道》(Россия 1)

第二大電視頻道, 1991 年於蘇聯《第二頻道》的基礎上所創立, 國營《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持有。在規模和收視人口是第二大頻道, 緊追《第一頻道》之後, 兩個頻道也因其內容類似性而成為競爭對手。根據俄羅斯調查研究公司 Mediascope 的收視率調查結果, 《俄羅斯 1 頻道》常超越《第一頻道》。

## 3、《俄羅斯 24 頻道》(Россия 24)

國營《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另持有《俄羅斯-24 頻道》, 報導國內外大事的俄語新聞頻道。2010 年以前稱為《時事》(Вести), 2010 年 1 月 1 日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重新命名為《俄羅斯 24 頻道》。

## 4、《今日俄羅斯頻道》(Russia Today)

成立於 2005 年, 針對國內外事件報導的官方英語頻道, 是第一家數位化的俄羅斯電視頻道。主要針對俄羅斯境外閱聽人, 在俄羅斯國內它僅於有線電視網播放, 是塑造國家形象的重要頻道。

### (二)、《國家媒體集團》

《國家媒體集團》成立於 2008 年, 是由《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Сбербанк России)大股東的科瓦利丘克(Юрий Ковальчук)、《謝韋爾鋼鐵公司》(Северсталь)執行長摩達雪夫(Алексей Мордашов), 和保險集團 Sogaz(СОГАЗ;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的子公司)的資產組合而成, 科瓦利丘克還是《蘇爾古特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Сургутнефтегаз)和保險集團 Sogaz 的經營者, 科瓦利丘克影響力巨大, 媒體皆稱科瓦利丘克為國家媒體集團的主要負

責人<sup>4</sup>，他並以和總統普欽友好而聞名。

### 1、Ren TV(РЕН ТВ)

Ren TV 是由伊雷娜·列斯涅夫斯卡雅(Ирена Лесневская)和她的兒子德米特里·列斯涅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Лесневский)於 90 年代中期所創立。2011 年底，由俄羅斯銀行的科瓦利丘克為首控股的國家媒體集團，增加自己在 Ren TV 的持股將近 100%，

### 2、《第五頻道》(Пятый канал)

國家媒體集團除了 Ren TV 外，也是第五頻道的最大股東(72.4%)，另一持有者為聖彼得堡市政府(27.6%)。原本在聖彼得堡播放，2007 年普欽簽署法令，使第五頻道得以在俄羅斯全境播出。政治立場和國有頻道一致，影響力在聖彼得堡以外地區並不高。

## (三)、國營《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旗下的《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 Холдинг)<sup>5</sup>

### 1、NTV(НТВ)

曾為古辛斯基橋媒體中最重要的電視頻道，現在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分公司的媒體集團—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所持有。NTV 過去曾為最多元自由的頻道，但目前的政治內容和其他國有頻道一樣保守，完全喪失過去特色。

### 2、TNT(ТНТ)

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旗下還擁有 TNT 頻道，在俄羅斯相當受歡迎，主要播放喜劇和真人情境秀，節目內容由於過於羶色腥，常引起社會人士批判。

<sup>4</sup> 科瓦利丘克是普欽親近的友人之一，《國家媒體集團》的媒體資產還包括《第五頻道》(Пятый Канал) (72.4%股份)，廣播《俄羅斯新聞服務》(Русская Служба Новостей) (100%股份)，《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 (98.32%股份)，《體育快報》(Спорт Экспресс) (75%股份) 和 Metro-Petersburg(Метро-Петербург) (100%股份)。此外，《國家媒體集團》旗下還包括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的 Media Alliance 公司，Media Alliance 負責管理俄羅斯版本的 Discovery 和 Eurosport。

<sup>5</sup> 《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 Холдинг)掌控的媒體如下：NTV(НТВ)，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持有 86%的股份(其中 35%直接持股，51%則由 Aura-Media 公司間接持有)、娛樂頻道 TNT(ТНТ)、TNT4(ТНТ4)、TV3(ТВ 3)、《星期五》(Пятница)、《2x2》，體育電視頻道《競賽》(Матч)，廣播電台 Autoradio(Автораддио)、《兒童廣播》(Детское Радио)、Comedy Radio、Like FM、Relax FM、電台《浪漫》(Романтика)、NRJ、《莫斯科迴聲》(Эхо Москвы)、《幽默調頻》(Юмор ФМ)，雜誌《一周電視節目》(Семь Дней ТВ-Программа)、Caravan Stories(Караван Историй)。另外，還擁有製作公司 Comedy Club Production、Good Story Media、Central Partnership 和 Red Media 的經銷商，網際網路服務商 101.ru、Rutube、Now.ru、Zoomby、vokrug.tv，衛星電視營運商 NTV Plus(НТВ Плюс)。

### 3、TV3 (ТВ3)

娛樂頻道，節目內容以連續劇、藝術片和紀錄片為主。

#### (四)、俄羅斯國防部

##### 《紅星》(Звезда)

俄羅斯《國防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所掌控，2005 年開播時只有在莫斯科才看的到，2006 年開始向俄羅斯全國播出。節目宗旨為「發展民眾的愛國情感、對祖國的愛、對偉大歷史的驕傲、對國家未來的信仰、並建立俄羅斯軍隊的正面形象」(Сафонов, И., 2005)。

#### (五)、莫斯科市政府

##### 《中心電視台》(ТВ Центр)

以同名法人公司(股份公司形式)營運。自盧日科夫(Юрий Лужков)時代以來，該頻道是莫斯科市政府的主要喉舌，目前仍隸屬於莫斯科市政府。

## 二、獨立的電視頻道

### (一)、Euronews

Euronews 是一家歐洲的付費電視新聞頻道，由幾家歐洲和北非國家廣播組織共同擁有，自 2015 年以來，由埃及政治人物及富豪薩維里斯(Naguib Sawiris)持有的 Media Globe Networks 掌控多數股權(60%)。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也是該頻道股份的所有者之一，擁有 Euronews 2.29%的股份(Николов Алексей, 2017)。全球共有 26 個股份持有者，包括 Media Globe Networks(60%)，環球影業有限公司(NBC 新聞)(25%)，法國電視 France Televisions，意大利的 RAI 電視台，土耳其 TRT 電視台，瑞士 SSR 電視台等等。

### (二)、RBC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изнес-телеканал, РБК)

是 RosBusiness 顧問公司(РосБизнесКонсалтинг)的分支，並集中在商業財經新聞的播出。其每週的觀眾約佔俄羅斯城市人口的 4%，白領階級、管理階層、以及富有人士為主要收視族群。2016 年巴拿馬事件報導據稱讓政府中央不滿，RBC 集團總編輯奧塞辛斯卡婭(Елизавета Осетинская)及兩位編輯在壓力下辭職(Афанасьева, А., & Тихонов, Д., 2016)。

### (三)、*Rain TV*(*Дождь*)

95%的股份為媒體人欣婕耶娃(Наталья Синдеева)<sup>6</sup>所持有，5%股份由克利切夫斯卡雅(Вера Кричевская)所有。克利切夫斯卡雅為記者及節目製作人，過去曾於 *NTV* 的《人類學》(*Антропология*)和《言論自由》(*Свобода слова*) 節目擔任製作人。*Rain TV* 是一個艱苦掙扎的獨立頻道，基於電視台對於報導爭議議題上(如 2011-2012 示威遊行、烏克蘭戰爭)和其他電視台呈現不同及多元的角度，2014 年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還授予 *Rain TV* 前總編輯濟加爾(Михаил Зыгарь)以國際新聞自由獎(Nemtsova, A., 2015)<sup>7</sup>。2016 年該電視台因關於高官的豪華別墅報導，被施加壓力從莫斯科市中心的工作室遷出，而必須暫時在私人公寓內運營數月。此後，*Rain TV* 改變其商業模式，將重點轉向數位和付費用戶(Венуинов, К., 2016)。

根據列瓦達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7 年前半年的調查顯示，《第一頻道》、《俄羅斯 1 頻道》、*NTV* 和《俄羅斯 24 頻道》是排名前四位獲取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Волков, Д., & Гончаров, С., 2017)。

不過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觀看電視新聞節目的選擇更加多樣化，有更多人看 *Ren TV*、*RBC TV* 和 *Euronews*。大城市的居民，更願意去了解事件呈現上的不同觀點。另外從 2011 年到 2016 年，電視作為年輕人主要新聞來源的使用明顯下降，網路則是不斷增長中(Волков, Д., & Гончаров, С., 2017)。儘管新媒體的影響明顯增長，俄羅斯的主要傳播管道還是電視，俄羅斯全國電視網路覆蓋了 1.4 億人口中的 90% 以上(Дондурей, Д., 2013)。

*RBC TV*、*Rain TV*、*Euronews* 頻道較不受政府干預，對爭議事件提出多元的看法，因此被認為是獨立的頻道，這些頻道在高收入人群中較受歡迎。就調查顯示，在獨立電視頻道的閱聽人中，也存在支持政府的大量人口；就算比起聯邦電視台的人數少，但收看獨立的電視台觀眾還是最支持統一俄羅斯黨，普欽也還是

---

<sup>6</sup> 欣婕耶娃也是《Silver Rain》(《Серебряный Дождь》)廣播電台的創始人和所有者之一，她還掌控《Rain》集團旗下其他媒體 - 像是雜誌《Big City》(之前由出版社《布告》(《Афиша》)所有)和 Republic 網站(過去的入口網站是 Slon.ru)。

<sup>7</sup> 濟加爾在 2015 年發表的《克里姆林宮的手下們》(All the Kremlin's Men)一書中，經由採訪資料的整理，描述政府決策過程，以及總統普欽身邊的權力鬥爭。《莫斯科迴聲》總編輯阿列克謝·維涅季克托夫(Алекс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認為此書造成克宮政治菁英大為憤怒，使得濟加爾迫於壓力離開 *Rain TV*。「1917 自由歷史」網站幫歷史人物建立社交帳戶，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頁面上不定期發布消息。網站於 2018 年 1 月停止更新，濟加爾又成立另一個新網站《歷史地圖》(Карта Истории)，用戶可以和網站互動，幫歷史人物選擇他下一步該如何行動。



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Волков, Д., & Гончаров, С., 2017)。

表 2 俄羅斯重要電視頻道所有權結構

電視頻道	所有者	股份
第一頻道 (Первый Канал)	聯邦國家財產管理局(Росимущество) 國家媒體集團(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едиа Группа, ЗАО)持股 100%的 Rastrokom-2002 公司(Растком-2002, ООО) 俄大亨阿布拉莫維奇(Роман Абрамович) 持股 100%的 ORT-KB 公司(ОРТ-КБ, ООО) 俄通社-塔斯社(ТАСС) 奧斯塔基諾電視技術中心有限公司(Останкино, ООО)	38.9% 25% 24% 9.1% 3%
俄羅斯 1 頻 道(Россия 1)	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公司(ВГТРК)	100%
俄羅斯 24 頻 道(Россия 24)	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公司(ВГТРК)	100%
今日俄羅斯 (RT; Russia Today)	聯邦國家財產管理局(Росимущество)持股 100%的聯邦 國家單一制企業俄羅斯國際通訊社俄新社(РИА)	100%
REN TV (РЕН ТВ)	國家媒體集團(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едиа Группа) 俄羅斯保險集團 Sogaz (Согаз, АО)持股 100%的 Sogaz Tower (Согаз Тауэр, АО)	82% 18%
《第五頻 道》(Пятый Канал)	國家媒體集團 聖彼得堡市政府(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72.4 % 27.6 %
NTV(НТВ)	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 Холдинг, АО) 持股 99,94%的 Aura Media 公司(Аура-Медиа, ООО) 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 Холдинг, АО) PRT-1 有限公司(ПРТ-1, ООО)	51% 35% 14%
TNT(ТНТ)	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	100%
TV3 (ТВ3)	俄羅斯天然氣媒體集團	100%

電視頻道	所有者	股份
星星(Звезда)	俄羅斯國防部持股 100%的紅星公司(ТО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ОАО)	99.99%
	俄羅斯國防部(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0.01%
中心電視台 (ТВ Центр)	莫斯科市政府財產部門(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ы, Москоммущество)	99.2326 %
	工貿中心股份公司(АО «Промторгцентр»)	0.7674 %
EuroNews	Media Globe Networks	60%
	環球影業有限公司(Universal Studios Limited, NBC News)	25%
	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公司	2.29%
	其他	12.71%
RBC(РБК)	俄羅斯商業諮詢公司(ОАО «РосБизнесКонсалтинг»)	100%
Rain (Дождь)	欣婕耶娃(Синдеева Наталь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95%
	克利切夫斯卡雅(Кричевская Вера Ефимовна)	5%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整理自 Матвеев, М., & Гатаулин, Ф. “На Голубом Глазу: Кто Они, Повелители Телеэфира России и Татарстана,” *Реальное время*, Январь 31, 2017 г., <<https://realnoevremya.ru/articles/53920-komu-prinadlezhat-telekanaly-rossii>>

綜合以上俄羅斯電視分析，可看出電視受到政府嚴格控制。而在各種媒體中，民眾對電視的信任度高於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和社群網站(Волков, Д., & Гончаров, С., 2017)。電視可信度高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所代表的權威性，俄國民眾的認知源自於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生活經歷。當時，私營媒體更迭頻繁，國家媒體則是穩定不變；也因此「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可信賴的標誌。這也呼應《社會輿論基金會》主題為「俄羅斯目前需要改革或是穩定」的調查，三分之二的俄羅斯人認為，確保穩定比實施改革更為重要(FOM, 2016)。在經歷 90 年代劇烈的社會動盪後，維持穩定是俄羅斯人認為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而國家所掌控的電視媒體能確保民眾需求。

## 肆、電視節目中的愛國主義宣傳

### 一、新聞時事及政治脫口秀節目

俄羅斯電視台所有權大部分是掌控在克里姆林宮和普欽親信手中，不過在愛國意識的內容上，由過去研究顯示，並非是像蘇聯時期，直接進行審查，並強制記者遵守，有更複雜的機制可以確保記者的忠誠度和可靠性。學者研究發現，在聯邦電視頻道工作的記者所需的主要特性是「相稱性」(Адекватность)。「相稱性」意味著尋求「正確」、「合適」的本能以及適當判斷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說，記者應了解其工作的運作方式，避免違反某些不成文的法律(Schinpfossel, E., & Yablokov, I., 2014)。

脫口秀節目是現今最受歡迎的新聞時事節目類型之一。研究媒體的學者在比較 1995 年和 2017 年第一頻道的電視節目結構時發現，第一頻道在 90 年代曾有過多元的電視節目類型，但現在則是充斥著攻擊仇恨的脫口秀節目(Насырова, И., 2017)。烏克蘭戰爭是時事諷刺脫口秀的轉折點。脫口秀的製作人和喜劇演員都知道對政府嘲弄是一種冒險，但沒有成文規定告訴演員界線在哪裡，所有這些都是基於不成文的規則。

《第一頻道》(Первый канал)播出的 KVN(Club of the Funny and Inventive People; 俄文 Клуб Весёлых и Находчивых, 縮寫 КВН)是自蘇聯以來歷史悠久、最受歡迎的喜劇節目，同時也是最盛大的搞笑藝人選拔大賽。過去每年都有來自全國大學和各地的代表隊進行角逐，通過幽默問答、喜劇表演等，決選出優勝隊伍。在重建改革(Пересройка)期間，KVN 生產了豐盛有趣的政治諷刺內容，經常激怒蘇聯當局。但如今 KVN 已成為克里姆林宮宣傳的另一個分支，仇外心理和種族性別歧視的嘲諷取代了過去詼諧的政治搞笑，普欽本人則是該節目的忠實粉絲。節日常以恭維的口吻提及普欽，例如 2017 年 G20 峰會的短劇，將普欽描述為運動健將以及柔道高手，而西方國家總統相形之下顯得笨拙而愚蠢(奧爾加·羅賓遜，2018)。

另一個國有頻道 TNT 電視台備受喜愛的脫口秀節目《喜劇俱樂部》(Comedy Club)中，演員格拉喬夫(Дмитрий Грачев)以模仿普欽著稱。眾所周知，普欽是格拉喬夫的粉絲，同時也為這個脫口秀節目公開表示認可和祝福。這也顯示出其中的暗示：類似節目需要政府的批准，克里姆林宮認為無傷大雅的諷刺對政府開明形象有潛在的好處。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現今大多數喜劇節目內容都無關緊要，要

麼不涉及政治話題，要麼就是嘲諷西方的敵人（奧爾加·羅賓遜，2018）。

除了時事脫口秀外，在新聞評論節目中，熟練於掌控愛國意識敘事的有幾位著名主持人，其中最具權威性的是《今日俄羅斯通訊社》(*Russia Today*)總裁基謝廖夫(Дмитрий Киселёв)。基謝廖夫強調，言論自由和多元化的原則是他新聞節目中的重點，節目具有廣泛多元的觀點，而他自認是開明溫和的保守派。他主張，如果國家在媒體上投資，它有權要求這個媒體遵循國家的政策(Schinpfoss, E., & Yablokov, I., 2014)。

不過實際上，基謝廖夫的言論常表現為單一反西方的言論，西方國家是攻擊的主要目標。他曾在《俄羅斯 24 頻道》的〈每週時事〉(*Вести Недели*)評論節目中說，「俄羅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將美國變成放射性灰燼的國家，」背景則是核爆炸後的蘑菇雲圖像(Kelly, L., 2014)。根據俄羅斯調查研究公司 Mediascope 的調查，〈每週時事〉平均每 6 個俄羅斯人中就有 1 個人觀看(Ferris-Rotman, A., 2017)。

2014 年烏克蘭戰爭期間，新聞評論節目時間延長兩倍，完全集中於烏克蘭議題，採用電影手法和特效、配樂和戲劇效果，俄國觀眾全神注目於這場戰爭秀，因此新聞節目在這段時期破天荒地高居收視排行榜第一名，擊敗其他類型節目，第一頻道不例外地排名所有新聞節目首位（亞凱迪·奧卓夫斯基，2017）。

在國家電視台的宣傳中，除了將西方國家描繪成敵人外，也需要把俄羅斯描繪為一個遭受四面八方攻擊和威脅的國家；國家電視臺常常播放俄羅斯飛機在敘利亞上空作戰的視頻，穿插著北約(NATO)坦克和軍隊威脅俄羅斯邊境的畫面。在《俄羅斯 1 頻道》收視率相當高的政治脫口秀節目《60 分鐘》(60 минут)中，評論員伊薩耶夫(Никита Исаев)談到俄羅斯在敘利亞取得的「巨大勝利」，預示著俄國將重返「超級大國地位」(Matthews, O., 2017)。其宣傳為自古以來多國使用的計策：將國家團結在一個假想的外部敵人下，以分散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

2014 年普欽稱歐洲民主聯盟「訴諸恐怖、謀殺和大屠殺」，「民族主義者、新納粹主義者、恐俄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執行了這次政變」(Путин, В., 2014)。

而這段期間俄羅斯電視也進行某些對敵方的負面宣傳，如北約部隊加入了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行列(Kuzio, T., 2015)。還包括駭人聽聞的謊言，如烏克蘭武裝部隊當著一名 3 歲兒童的母親面前，將孩子釘在木製告示板上，讓他在痛苦中死去；還有一位母親被綁在一輛烏克蘭坦克車上，車子拖著她穿過街道，直到她死

亡。據稱在頓巴斯地區犯下這些暴行的烏克蘭士兵是「野獸和法西斯分子」(Ash, L., 2015)。

許多評論家指出，俄羅斯電視的仇外言論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危機期間，助長了衝突和暴力行為的煽動；這些仇恨言論包括一些強化刻板印象的說法，像是稱烏克蘭境內的反俄吞併者為「法西斯分子」、「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等(Esch, C., 2015)。學者認為俄羅斯電視的言論讓人想起了蘇聯冷戰時代的宣傳攻勢，但由於目前運用於媒體宣傳的預算為上億美元，因此造成的效果和範圍也再加大(Hutchings, S., Tolz, V., 2015)。

在報導政治議題或進行政治嘲諷時，有隱而不宣的遊戲規則，同時也已內化為職業規範，人們很清楚其中的局限；在愛國主義得以發揚的範圍內，維護所謂的「相稱性」，謹慎發揮自己的創作自由。媒體經常使用圖像、符號、隱喻和引用來塑造和解釋外來的風險(Kasperson, R.,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 Emel, J., 1988)，尤其是電視媒體，由於其身臨其境的、情緒化的內容以及視聽刺激的傳播能力(Binder, A., Cacciatore, M., Scheufele, D., & Brossard, D., 2014)。在媒體敘事中的情感線索，無論是新聞還是虛構的，可能會放大威脅所構成的風險，進而導致政府只要提出任何可減輕威脅的政策和法規，公眾都會給予更大的支持(Cooper, K., & Nisbet, E., 2016)。

## 二、戲劇節目

除了脫口秀及新聞評論節目外，俄羅斯政府對於戲劇節目也加以管理(Ferris-Rotman, A., 2017)，並試圖加入愛國意識的元素。對俄羅斯政府形象有所損傷的內容是不被稱許的，而在吞併克里米亞之後，在戲劇中注入抵抗外敵的劇情，同時也加強俄羅斯軍事歷史和革命戰爭的主題，特別是英雄敘事內容。

整體來說，電視在當代俄羅斯是塑造文化和輿論最具影響力的機構，然而，正如媒體專家茲韋列娃(Вера Зверева)所說，「俄羅斯電視的內容很少是現代文化專家研究的對象」(Зверева, B., 2006)，這也使得分析電視如何傳播其資訊變得至關重要。電視中的影像將虛實內容混合，使大眾在辨別其中差異愈加困難；戲劇以一種令人愉悅的、讓人不加提防的方式傳播社會倫理和政治意識形態，填補了精心製作和控制的新聞片段、及其他非虛構內容的空白片段。研究後蘇聯時期媒體的學者認為，「電視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夢想』，它為中央的意義詮釋控制提供了無限的潛力。」(Beumers, Birgit et al., 2009)

曾於國家電視台工作的白俄羅斯裔編劇菲利潘科(Саша Филипенко)，後來在電視台 *Rain TV* 編寫過一套動畫劇本：一位天使和兩個惡魔住在普欽總統的大腦裡。他們每天思考決定如何統治俄羅斯。天使，寡不敵眾，總是失敗；留下的惡魔們則歡慶著為所欲為。這個「上帝，多麼尷尬」的試播動畫，從未能夠出現在俄羅斯電視螢光幕上。即使對於俄羅斯獨立的電視頻道 *Rain TV* 來說，這個節目也太過挑釁；菲利潘科被主管告知這個劇情「太過分了」(Rasputina, E., 2016)。

對愛國意識有所損傷的戲劇是不受祝福的。《俄羅斯 1 頻道》以 20 世紀 60 年代的蘇聯年輕外交官團隊為故事中心，製作名為 *The Optimists*(Оптимисты)的戲劇，是由拉脫維亞出生的美國記者兼編劇伊多夫(Michael Idov)創作，它將蘇聯描繪成迷人無瑕，甚至是田園史詩般的時代。但是在 *The Optimists* 故事發展到中段，劇中人物對蘇維埃政權越來越失望。在這之後，《俄羅斯 1 頻道》為讓戲劇儘快播完，便改變時段安排，在一周內連續播放了十三集。

由於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西方實施制裁，俄羅斯經濟陷入困境，克里姆林宮在戲劇節目中注入抵抗外敵的愛國意識形態，視為一種將民眾的注意力從國際危機轉移的方式；因此隨著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使用緊張局勢作為故事情節的節目飆升。在國營莫斯科 *360TV* 頻道所播放的《俄羅斯製造》(Сделано в России)真人秀節目中，第三季內容即為年輕夫婦放棄了歐洲製造的汽車和衣服，蔑視美國和歐洲的制裁。俄羅斯採取了反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歐洲食品進口；此舉最初看來損害俄羅斯消費者的權益，但最終卻發現推動了國內市場的成長。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製造》中的夫婦，發現俄羅斯產品比較起來品質更好。

2017 年 *TNT* 開播的另一部熱門戲劇 *Adaptation*(Адаптация)中，也顯示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等事件上和西方國家關係僵局的回應。一名扮演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官員在 *Adaptation* 中開玩笑地說，「要歸還克里米亞是不可能的」，「(不過)其他一切都是可能的」。同年第一頻道的 *Sleepers*(Спящие)，則是詹姆斯邦德的俄國版本，俄羅聯邦安全局幹員和潛藏在俄國內部的間諜鬥智，並在一系列的挑戰中戰勝美國中央情報局。

這些戲劇節目的敘事很清楚。俄羅斯是一個有勇氣的國家，並在國內外對抗西方國家勢力並得勝。尤其是西方媒體常對俄羅斯提出許多質疑，俄羅斯電視劇集的軟性宣傳對民眾來說是提升國家認同的一劑強心針。

就算是戲劇中對當局有所嘲諷，但絕對不能對普欽採取負面或批判性的角度。俄羅斯每週三晚上 9 點在 TNT 播放的喜劇 *Once Upon a Time in Russia(Однажды в России)*，根據俄羅斯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Mediascope 的數據，每 15 位電視觀眾中就有 1 位觀看(Ferris-Rotman, A., 2017)。故事情節描述俄羅斯生活的現實，嘲笑當代俄羅斯人的生活，像是廣泛存在的腐敗，不過是以一種輕鬆交待的方式，而不是攻擊批判；劇集以幽默的方式呈現從保全到官員的各種賄賂方式，甚至俄羅斯政治人物也受到嘲弄，但只是輕描淡寫帶過。

專門研究俄羅斯幽默和笑話的歷史學家阿爾希波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Архипова)分析，普欽從來就不是笑話的主角，今天俄羅斯絕大多數的政治笑話都是關於圍繞在普欽身旁的人。阿爾希波娃發現，俄國人嘲笑政治菁英的失言或行為，但對普欽則是非常保護(Rasputina, E., 2016)。

戰爭歷史類型也是目前重要的戲劇主題之一。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關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的電影，一直在電視台常年播放。蘇聯解體後，由於財政的困窘，俄羅斯電視台曾對繼續製作這類戲劇短暫地失去了興趣，在試圖應對新資本主義社會品味的文化混亂中，進口墨西哥電視劇要便宜得多，也更有利可圖。在上世紀 90 年代末，俄羅斯電視臺開始自製戲劇，並在戲劇中加入對蘇聯過去的懷舊情緒。在最近幾年裡，克里姆林宮強調俄羅斯軍事歷史和革命戰爭的主題，特別是英雄敘事內容。《俄羅斯文化部》也給予更多的資金，製作俄羅斯軍事歷史等具有愛國意識的電影(Child, B., 2016)。

除了對蘇聯懷舊情緒的戲劇外，國家也投資製作文學改編的歷史劇，尤其重視傳奇政治領袖及人物，例如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史達林等，來傳達符合當前政治現狀的價值觀。《第一頻道》2018 年播出八集電視戲劇《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電視台執行長康斯坦丁·恩斯特稱其為「俄羅斯史上第一部獻給托洛茨基的電視劇」。歷史學家雷茲尼克(Александр Резник)對於電視台選擇托洛茨基，而不是史達林，提出看法。他說，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中，托洛茨基是俄羅斯最完美的反英雄。這部電視劇對托洛茨基的刻畫，與普欽總統的反對者阿列克謝·納瓦爾尼(Алексей Навальный)如出一轍，「所以給俄羅斯年輕人的訊息很明顯：納瓦爾尼可能很有魅力，說話也很得體，但他和托洛茨基的特質一樣，具破壞性、野蠻、不愛國，可能還在為外國政府工作。」(Konstantin, K., 2018)

自普欽上台以來，國有媒體在愛國主義宣傳上越見著力，克里姆林宮成功地

將國家面臨的困境，包裝在愛國意識的宣傳下，使人民欣然接受之。除了脫口秀及時事評論的直接宣傳外，並透過精心製作的戲劇，將虛構或歷史改編的故事情節，結合含蓄的政治資訊，是使權力結構正當化的有效方法。

## 伍、總結

本文首先分析普欽政府如何透過愛國主義政策的制定，來推行愛國主義思想。發現自 2000 年以來，普欽便逐漸將愛國主義作為國家發展的核心理念，希望讓俄羅斯恢復過往的大國地位。為了強調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性，他常直接利用演講、宣示和電視直播的方式來表達立場。在他首次向聯邦議會發表總統談話時，將愛國主義描述為「文化傳統和共同的歷史記憶」，能將俄羅斯全民聯繫在一起(Путин, В., 2000)。在 2012 年的談話中，他將「民族和精神認同」和「愛國主義」列為鞏固國家的基礎(Путин, В., 2012)。2016 年更稱愛國主義應為唯一的國家思想，其他思想都不用考慮。

同時，俄羅斯政府制定了一個愛國主義動員體系，由從聯邦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國家機構來執行。主要執行機構為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緊急情況部、文化部、教育部和新聞出版與傳媒署。這項政策由一系列聯邦法案支持，從教育系統、軍事國防到大眾傳播媒體等，範圍廣大。2001 年政府開始採取四個連續的愛國主義教育五年計劃，根據四個計劃的官方檔案，愛國主義教育「旨在形成和發展具有愛國主義的祖國公民素質、能夠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成功履行公民義務的個人」(Перемитин, Г., 2016)。在愛國主義思想的推行上頗有成效，根據《全俄輿論調查中心》2018 年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自稱為愛國者的俄羅斯人的比例為 92%，是 2000 年以來的最高人數。

其次，本研究也分析目前俄羅斯最重要的電視頻道，分析其所有權結構，並了解哪些是由政府及其親近財團所控制？獨立電視台能否發揮作用？本研究經由電視台公開網頁及相關文獻整理出俄國電視所有權結構，發現重要電視頻道皆由政府及其親近財團所控制，雖有獨立電視台，但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在過去對專制國家的研究中，發現當權者長期以來偏好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影響其人民(Stockman, D., Gallagher, M., 2011)。而在各種形式的大眾傳播媒體當中，電視通常是專制政權中控制最嚴格的媒體形式，因為它具有廣泛的覆蓋面和高使用度(Norris, P., Inglehart, R., 2010)。因此在上世紀 90 年代的政治動盪和經濟崩潰



之後，俄政府為了奪回在世界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便把電視媒體做為傳播國家核心價值的主要工具。

本研究發現，在普欽政府中，提供民眾政治和公共事務資訊來源的媒體最重要的是電視媒體，尤其是國家電視頻道，它們幾乎 100% 覆蓋全俄羅斯。幾個主要的國家電視頻道被用作為國家宣傳的工具，莫斯科大學學者卡曲卡也娃甚至認為電視媒體彷彿回到蘇聯時代。其他的傳播管道則相對影響力較小—報紙、廣播、網路和小型獨立電視台，雖仍有不少敢於挑戰政府、甚至對政府濫權進行調查性報導的記者，但統治菁英並未感受太大的威脅；因為在受控的輿論環境中，獨立媒體的報導對政府決策幾乎起不了太大作用。

再者，在回答電視節目如何注入愛國思想的研究問題上，本研究以新聞時事評論和脫口秀節目，以及戲劇節目來分析。本研究發現，在聯邦電視頻道工作的記者所需的主要特性是「相稱性」，記者經常要弄清楚在敏感時刻何種言論是政治正確，因此便會進行自我審查，以避免不必要的風險。而在克里米亞危機後，國家電視台的新聞時事節目中，將西方國家描繪成敵人，便成為一致性的敘事方式。在戲劇節目中，對愛國意識或是對領導人的負面情節是不被允許的。俄吞併克里米亞後，在戲劇節目中同樣也注入了抵抗外敵的愛國意識形態，做為提升民眾對國家認同的一劑強心針。

最後，本研究也從愛國主義的概念來思考，俄羅斯電視媒體的愛國主義情緒，若從學者對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定義來看，是否反而形成敵視性的民族主義？

2011 年至 2012 年，俄羅斯爆發了反對普欽第三次連任總統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儘管如此，普欽還是贏得了選舉；但他一上臺，為了爭取人民對克里姆林宮的支持，就更強化愛國主義宣傳，把異見描繪成煽動叛亂，反西方言論也持續增加。2014 年爆發克里米亞危機，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由於此舉違反國際法，西方國家組成聯盟對俄施加政治和經濟制裁；在這之後，反對及敵視西方的言論明顯增加。在對外上，日益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幫助俄羅斯成功吞併克里米亞，愛國主義宣傳為俄羅斯在海外採取更強硬的行動爭取到人民的支持，而這種行動反過來對內也增強了國民對國家的向心力，提高了政府的支持率。西方國家雖因此對俄羅斯進行相關制裁，但在國內並未受到太大的反彈聲浪。

回顧前言中愛國主義的概念，德國學者 Mummendey 曾比較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區別，兩者同樣都對國家懷有熱愛和強烈認同感，但民族主義是透過排斥

他者，貶低敵對民族價值，來強化國家認同；而愛國主義則是將來自國家內部的缺陷，看作是需要改進的「他者」。

本研究發現，在實際運用上，俄羅斯官方對於愛國主義或是民族主義的運用和內涵的詮釋，端賴其宣傳戰術的目的而定；例如 2014 年俄羅斯人民對吞併克里米亞的熱情正面回應，在俄羅斯被解讀為愛國主義的表現，而民族主義則是用在描述本地的極端主義分子和分裂份子(Goode, P., 2016)。克里姆林宮認可的電視台記者雪夫申科(Maxim Shevchenko)在標題名為《我們不是歐洲？感謝上帝！》的專欄中說，「俄羅斯正與西方交戰...大多數西方人屬於跟我們不同的人類族群，此種感受越來越強烈；基礎內在卻不一樣。」(亞凱迪·奧卓夫斯基，2017)顯見若是對當局的軍事行動加以批評，輕易即被指謫為負面的民族主義份子涵義；而和政府立場相同的行為，不管是否具有正當性，媒體則是用雙重標準定義為正面的愛國主義表現。

如德國學者 Mummendey 所提及民族主義概念，俄羅斯政府在電視宣傳上，實際上是宣揚民族主義概念，將西方國家作為敵對的「他者」，區分出「我族」和「他者」；在新聞時事節目中將西方國家或反對俄國政府立場者貼標籤為「敵人」、「野獸」、「法西斯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等極端意識形態份子；而在戲劇中注入抵抗西方敵人的意識型態，但是對國內既存貪腐或執政問題，卻是以輕描方式帶過。在宣傳語言的運用上，俄羅斯電視媒體宣揚的愛國主義，常把來自烏克蘭西方盟友的威脅，等同於過去來自於納粹的壓迫；這也使得人民很容易將西方視為威脅俄羅斯的恐懼來源，這種恐懼可能會經由媒體的傳播而放大。

自 2000 年以來，愛國主義一直是俄政府致力於推行的思想，透過所有重要電視頻道宣傳，成功轉移人民對國內既存問題的注視，將注意力轉移對外攻擊西方敵人；雖然愛國主義可以增強國家凝聚力，但實際運作上卻轉化成敵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可能造成不斷的衝突和爭端。

本文分析普欽政府強力管控電視媒體，藉由電視節目宣傳愛國主義思想。本研究由於字數限制，未能將愛國主義等相關文獻深入探討，只有單就文中分析所需做重點整理，是不足之處。另外前文中學者強調所謂合宜的愛國主義，應將國家內部重要問題視為「他者」並致力改善，本文也因篇幅所限，未能仔細分析俄羅斯目前的國內問題，以及政府是否嚴格控制這方面的電視媒體內容，期望於下次研究主題再做深究。

## 參考文獻

- 王振寰 (1992)。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鄭瑞城等合著，**解構廣電媒體** (頁 77-128)。台北：澄社。
- 林麗雲 (2006)。威權主義下台灣電視資本的形成。**中華傳播學刊**，**9**：71-112。
- 胡曉光 (2016 年 1 月 2 日)。俄批准未來 5 年愛國主義教育國家計畫。**新華社**。  
取自<[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02/c\\_1117649937.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02/c_1117649937.htm)>
- 奧加廖沃 (2016 年 2 月 3 日)。普欽：俄羅斯的國家思想就是愛國主義。**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取自<<http://big5.sputniknews.cn/russia/201602031017947143/>>
- 奧爾加·羅賓遜 (2018 年 12 月 15 日)。俄羅斯和普京政權的新武器—幽默。**BBC 中文**。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6577083>>
- 楊芬雯 (譯) (2017)。**製造俄羅斯：從戈巴契夫到普丁**。(原著者：亞凱迪·奧卓夫斯基)。台北：馬可孛羅。
- Ash, L. (2015, Jan. 29). How Russia Outfoxes its Enemies. *BBC*, <<https://www.bbc.com/news/magazine-31020283>>.
- Becker, J. (2014). Russia and the New Authoritarians. *Demokratizatsiya*, Vol. 22, Issue 2, pp. 191-206.
- Benyumov, K. (2016, May 25). How Russia's Independent Media Was Dismantled Piece by Piece.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may/25/how-russia-independent-media-was-dismantled-piece-by-piece>>.
- Beumers, Birgit et al. (eds.). (2009). *The Post-Soviet Russian Media. Conflicting Signal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Binder, A., Cacciatore M., Scheufele D., and Brossard D. (2014). *The Role of News Media i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in H. Cho, T. Reimer, and K. McComa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Risk Communication*. Los Angele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69–85.
- Child, Ben. (2016, May 26). Russia calls for patriotic, anti-extremist movie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may/26/russia-movies-patriotic-culture-ministry-funding-labour-military-history>>.
- Cooper, K., & Nisbet E. (2016). Green Narratives: How Affective Responses to Media

- Messages Influence Risk Perception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About Environmental Haza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Vol.38, No.5, pp.626–54.
- Esch, C. (2015). “Banderites” vs. “New Russia”. *The Battle Field of History in the Ukraine Conflict*.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Hilary and Trinity Terms,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files/Banderites%20vs%20New%20Russia%20The%20Battlefield%20of%20History%20in%20the%20Ukraine%20Conflict.pdf>>.
- Ferris-Rotman, A. (2017, Oct. 12). How the Kremlin Shapes Russian Television. *Primetime-politic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17-10-12/>>.
- Goode , P. (2016).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or Why Cheese is More Patriotic than Crimea). *Russian Politics*, Vol.1, No.4, pp. 418–449.
- Goode, P. (2016). *Everyday Patriotism and Putin's Foreign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vent Ponars Eurasia Workshop on Russi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tanbul: Turkey.
- Goode, P. (2016, July). Everyday Patriotism and Putin’s Foreign Policy.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432*, <<http://www.ponarseurasia.org/memo/everyday-patriotism-and-putins-foreign-policy>>.
- Hutchings, S., Tolz, V. (2015). *Ethnicity and Race on Russian Television: Mediating post-Soviet difference*. Abingdon: Routledge.
- Kasperson, R.,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and Emel J.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Vol.8, No.2, pp. 177–87.
- Kelly, L. (2014, Mar. 17). Russia can turn US to radioactive ash - Kremlin-backed journalist.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raine-crisis-russia-kiselyov/russia-can-turn-us-to-radioactive-ash-kremlin-backed-journalist-idUSL6N0MD0P920140316>>.
- Khodzhaeva, E., Meyer I. (2017, Sept. 26). Mobilizing Patriotism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Forschungsstelle Osteuropa, ETH Zurich, *Center for Security*

- Studies* (CSS), Vol. 207, <https://www.research-collection.ethz.ch/handle/20.500.11850/200136>, p.3.
- Kohn, H. (2005).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J,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 328-350.
- Konstantin, K. (2018). New Russian TV Series Follows 'Rock 'n' Roll Hero' Trotsky. *Transitions Online,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p.1-1.
- Kremlin.ru. (2007, Apr. 26).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с Ежегодным Послание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38727>>.
- Kremlin.ru. (2014, Май 16).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kremlin.ru/events/administration/21027>>.
- Kuzio, T. (2015). Soviet and Russian anti-(Ukrainian) nationalism and re-Staliniz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http://dx.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5.12.005>>.
- Matthews, O. (2017). War is Peace, Ignorance is Strength. *Newsweek Global,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Vol.169, No. 22*.
- Mresearcher (2016, Июнь. 26). ВЦИОМ: Уровень Патриотизма Россиян в Июне 2016. *Mresearcher*, <<http://mresearcher.com/2016/06/vtsiom-uroven-patriotizma-rossiyan-v-iyune-2016.html>>.
- Mummendey, A., Klink, A., & Brown, R. (2001).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ut-group rej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40, No.2*, pp. 159-172.
- Nemtsova, A. (2015). Putin's Medusa. *Newsweek Global, 164(3)*, 18-19.
- Norris, P., Inglehart, R. (2010). Limits on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Support. In P. Norris, ed., *Public Sentinel: News Media & Governance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p. 193-220.
- Primoratz, I. (2002, Winter). Patriotism: A Deflationary View.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33, No.4*, pp. 443-446.
- Rasputina, E. (2016, Aug. 8). No Laughing Matter: Comedy and Censorship in Putin's Russia. *The Moscow Tim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no-laughing-matter-54892>>.

- Regnum. (2005, Apr. 25).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аспад СССР - Крупне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Века. *ИА Regnum*, <<https://regnum.ru/news/444083.html>>.
- Rogerson, K. (1997).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s: Russia and Poland Since the Fall of Communism.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31 Issue 3, pp.329-353.
- Russia Today. (2018, June 9). Patriotism in Russia at Highest Level in 18 Years – poll. *RT*, <<https://www.rt.com/politics/429231-patriotism-level-russia-highest/>>.
- Schatz, T., Staub, E., and Lavine, H. (1999).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 1, pp. 151-174
- Schinpfoss, E., & Yablokov, I. (2014). Coercion or Conformism? Censorship and Self-Censorship Among Russian Media Personalities and Reporters in the 2010s. *Demokratizatsiya*, Vol.22, No.2, pp. 295-311.
- Sharkov, D. (2017, May 9). Victory Day: Why is the May 9 Commemoration so Important to Russia? *Newsweek*, <<https://www.newsweek.com/what-may-ninth-and-why-it-so-important-russia-605639>>.
- Siebert, F.,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63).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 1-5.
- Stockman, D., Gallagher, M. (2011). “Remote Control: How the Media Sustain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4, pp. 436–67.
- Umland, A. (2012). The Claim of Russian Distinctiveness as Justification for Putin's Neo-Authoritarian Regime. *Russian Politics & Law*, Vol. 50, Issue 5, pp. 3-6.
- Yasaveev, I. (2017, Sept. 26). Mobilizing Patriotism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Forschungsstelle Osteuropa, ETH Zurich,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CSS)*, Vol. 207, pp.12-14, <<https://www.research-collection.ethz.ch/handle/20.500.11850/200136>>.
- Афанасьева, А., & Тихонов, Д. (2016, Май 13). Уволены Шеф-редактор и Глав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РБК: Медиахолдинг Покидают Елизавета Осетинская, Роман

Баданин, Максим Солюс. *Коммерсантъ*,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986828>>.

Беспалова, Т. (2011). *Патриотизм как Форма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в Конфликт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октор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А. И. Герцен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сия.

Волков, Д., Гончаров, С. (2017). Со Стола Социологов: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 1–2 (124), pp.105-129.

Дондурей, Д. (2013). “Телерейтинг как Воспитатель Нации,”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4.

Засурский, Я., Алексеева, М., Болотова, Л., & Варганова, Е. (2005).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узов*. (Я. Н. Засурский, Ред.).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Зверева, В. (2006).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Большого стиля” ? Закон и кулак: Родные милицейские телесериалы.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 стр. 305-323.

Коммерсант. (2001, Фев. 16).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01-2005 Годы." *kommersant.ru*, <<https://www.kommersant.ru/textsvlast/post.htm>>.

Коновченко, С. (2001). *Общество-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 власть*.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СКАГС.

Мартынов, М. (2009). Заметки о понятиях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патриотизм”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No. 11, стр. 138-141.

Матвеев, М., & Гатаулин, Ф. (2017, Янв. 31). На Голубом Глазу: Кто Они, Повелители Телеэфира России и Татарстана. *Реальное время*, <<https://realnoevremya.ru/articles/53920-komu-prinadlezhat-telekanaly-rossii>>.

Мацневская, Г. (2016). 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Науч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 Выпуск 38, № 24* (245), стр. 164-168.

Насырова, И. (2017, Мар. 9). Страх и ненависть в эфире: почему на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стало так много ток-шоу? *Дискурс*,

<https://discours.io/articles/culture/strah-i-nenavist-v-efire-pochemu-na-pervom-kanale-stalo-tak-mnogo-tok-shou>.

Николов, А. (2017, Сент. 5).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оизошло с Euronews. *RT*, <https://russian.rt.com/opinion/426778-nikolov-evronyuz-5-kanal>.

Перемитин, Г. (2016, Фев. 3). РБК: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возможную для Ро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ю. *RBC*, [www.rbc.ru/politics/03/02/2016/56b1f8a79a7947060162a5a7](http://www.rbc.ru/politics/03/02/2016/56b1f8a79a7947060162a5a7).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015, Дек. 30).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16–2020 Годы” . *Government.ru*, <http://government.ru/programs/664/about/>.

Путин, В. (2000, Июл. 8).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Kremlin.ru*,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480>.

Путин, В. (2012, Дек. 12).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Kremlin.ru*,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18>.

Путин, В. (2003, Май 16).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Kremlin.ru*,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998>.

Путин, В. (2004, Фев. 1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еред Доверенными Лицами. *Kremlin.ru*,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393>.

Путин, В. (2014, Мар.18).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Kremlin.ru*,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0, Окт. 11).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5 Октября 2010 г. N 795 г. Москв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11-2015 Годы. *Rg.ru*, <https://rg.ru/2010/10/11/patrioty-site-dok.html>.

Сафонов, И. (2005, Апр. 29). Звезда понесёт в провинцию здоровые иде. *Коммерсант*,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74405>.

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16, Июл. 22).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ли реформы?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ли Развитие Нужны Сейчас России? *FOM*, <https://fom.ru/TSennosti/12765>.

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17, Мар. 23). Патриотизм: динамика мнений.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атрибуты патриотов. *FOM*, <<https://fom.ru/TSennosti/13261>>.

# **The Control of Television Media by the Putin's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of Patriotic Propaganda**

**Jui-Hui Chiu<sup>1</sup>**

Abstract

Since Putin's reign, cultivating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citizens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ussian patriotic policies, from Putin's public speech and the relevant budget increases year by year,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atriotism propaganda. Since Russia's main television ownership is mostly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ts close or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it has allowed the Kremlin to exert maximum influence. In TV programs, the way to consolidate patriotism is to use anti-western rhetoric to shape a hostile "other", and shows that Russia is a brave country, which can fight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 at home and abroad and will eventually prevail.

**Keywords: Putin, television, ownership, patriotism, propaganda**

---

<sup>1</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 從盟友到對手：柯文哲參選市長的媒體建構之比較研究(2014 與 2018)

陳郁宜<sup>1</sup>

《摘要》

選舉新聞一向是各媒體關注的重點。尤其首都台北市長的藍綠白對決，詭譎多變的選情自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台灣媒體的各自立場涉及背後的所有權，使得各媒體利用框架、議題設定來論述政治問題的情形日益嚴重，而選舉新聞自是政治新聞中重要的一項報導主題。但媒體利用媒體力量去操控輿論，卻已成一股難以遏止的潮流。因此媒體在進行報導時，亦可見到處處呈現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論述。而多數媒體所呈現的政治立場多依其支持的政黨主張而有其一貫性。雖柯文哲一向是表達其偏綠的立場，但在2014年及2018年兩次的投入台北市長選舉，其與民進黨的關係已產生變化，2014年民進黨禮讓柯文哲並全力助其當選，使得柯文哲的白色力量中摻雜著綠色；但2018年民進黨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使得柯文哲的白中帶綠不再代表綠。而自由時報一向標榜台灣優先的綠媒如何報導柯文哲選舉新聞，及對柯文哲兩次參選台北市長的選舉新聞報導是否有著不同立場，遂成本研究關切的重點。

因此，本研究即試圖透過 Ruth Wodak 的論述策略，重新梳理自由時報的新聞文本，還原該媒體對兩次柯文哲選舉新聞報導的態度及立場，以釐清台灣對選舉候選人報導中所呈現的政治意涵及媒體角色。

**關鍵字：框架、論述策略**

---

<sup>1</sup> 銘傳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 壹、前言

台大醫師柯文哲以一位政治素人之姿於2014年首次投入選舉，就是角逐首都台北市長寶座。而在當年，民進黨決定禮讓不推派候選人參選。柯文哲則以白色力量為號召吸引藍綠及中間選民，最終贏得選舉當上台北市長。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柯文哲並沒有加入民進黨，和民進黨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但部分言論，尤其是兩岸一家親的說法又觸怒深綠選民。經過四年，柯文哲尋求連任之際，民進黨決定和他分道揚鑣，自行提名候選人參選台北市長。

綜觀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2014年及2018年其所處的時空環境都已發生變化。但其中最明顯的是柯文哲是否得到政黨，尤其是民進黨的奧援，雖柯文哲一向打著是白色力量，但其長久以來的綠色色彩一直沒變。2014年，其得到民進黨的支持讓其在選戰中呈現著白中帶綠，但2018年，少了民進黨這盟友，其選戰又是呈現白中帶？呢。

對於民眾關心的選舉新聞，自是各媒體關注的重點。尤其首都台北市長的選情自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另一方面，台灣媒體的各自立場常涉及背後的所有權，尤其近十多年來，隨著台灣政治情勢的變化，各媒體利用框架、議題設定來論述政治問題的情形日益嚴重，而選舉新聞更是政治新聞中重要的報導主題。但媒體利用媒體力量去操控輿論，早已成為難以遏止的潮流。因此媒體在進行報導時，亦可見到處處呈現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論述。而多數媒體所呈現的政治立場多依其支持的政黨主張而有其一貫性。2014年民進黨禮讓柯文哲並全力助其當選，使得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帶著民進黨的助力；但2018年民進黨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使得柯文哲處於完全無政黨奧援的情況，甚至和民進黨是競爭關係。這時一向標榜「台灣優先，自由第一」的自由時報，尤其是以其一向偏綠的政治立場(林麗雲，2008；林思平，2014)，是如何報導柯文哲兩次選舉新聞，尤其是2014年及2018年柯文哲的參選台北市長與民進黨關係產生變化之際，自由時報是採取何種論述策略，透過新聞評論對柯文哲選舉新聞報導進行報導，遂成本研究關切的重點。

因此，本研究即試圖透過Ruth Wodak批判論述分析策略，重新梳理自由時報的新聞評論文本，還原該媒體對兩次柯文哲選舉新聞報導的態度及立場，以釐清台灣對選舉候選人報導中所呈現的政治意涵及媒體角色。

## 貳、理論依據與相關文獻

高夫曼(Goffman, 1974)指出，所有社會事件，彼此無所歸屬，透過符號轉換(transformation)，即成為與個人內在心理有所關聯的主觀認知。這個轉換的過程，就是「框架」的基礎。在框架概念提出後，許多傳播學者逐漸將框架的概念引用於傳播研究上。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框架」指經新聞報導過濾，選擇呈現社會真實的本質。亦即，媒介報導所框限的社會真實的範圍和性質。吉特林(Gitlin, 1980)稱此為「媒介框架」(media frame)，並定義為：「符號操作者藉由選擇、強調、或排除文字和影像符號構成論述時，所形成的一種認知、詮釋、及呈現的固定模式」。伍弗斯斐 (Wolfsfeld, 1997: p.32)即指出，政治衝突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競逐「框架」(frames)，一方面參與權力角逐的政治精英企圖將配套的理念傳達給媒體；一方面媒體則建構政治衝突的框架。「論述」在這裡指著是一組陳述(statements)，是藉由某種形構規則所組成，它介入實然政治衝突中，在媒體文本中塑造客體、劃定疆界、區別敵我、形構關連等，藉由分析這些論述在媒體文本如何被形構，即可探究不同立場的論述如何被再現。

國內外有關報紙透過不同框架，再現新聞事件的相關研究的成果豐富。如早期吉特林(Gitlin, 1980)用框架概念討論媒介對 1960 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團體的報導，發現媒體藉由「認知、闡釋、呈現與選擇」的框架符號處理學生運動的新聞。吉默生和梅里格尼(Gamson & Madigliani, 1989)在研究核電議題的新聞框架時，分析美國主要新聞媒體有關核電的報導，他們發現，媒體對核電的詮釋有七種不同的框架，包括「進步」(progress)、「公共責任」(public accountability)、「能源獨立」(energy independence)、「惡魔的協議」(devil's bargain)、「逃避」(runaway)、「不敷有效成本」(not cost effective)、「軟性路線」(soft paths)等。每一個框架都隱含新聞的核心意義，媒體就是用這七種方式，凸顯對議題的整體詮釋，不管是正面的或負面的，贊成的或反對的報導，都能顯現出截然不同的意義。近期的研究更朝向各種面向的議題，包含選舉、軍事行動或氣候變遷(Reta, 2000; Bantimaroundis & Ban, 2001; Nwabueze & Egbra, 2016)等，去分析新聞報導中所運用的框架策略。而國內有關的研究成果亦十分豐碩(羅世宏, 1994; 王嵩音, 1998; 邱宜儀& 蘇蘅, 2009; 徐美苓, 2015)。這些研究均指出不同的新聞框架以不同的方式詮釋新聞，使新聞事件或議題呈現出不同的意義。

框架理論在處理政治過程中媒體對議題建構的角色有一定的助益，但在處理

本研究的素材上，還是有一些限制：首先，框架理論畢竟是較貼近心理學的系譜，文本的檢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進一步探究還需輔以閱聽人認知的調查；其次，框架途徑基本上只著重議題如何被組合與包裝，較不觸及議題後複雜的權力與意識型態糾葛；且在傳播研究上，框架途徑最常被應用處理的媒體文本，主要是報導部分。而本研究分析的重點在於評論，因此，決定採取Ruth Wodak批判論述分析策略來進行分析。

此分析途徑包括三個面向，包括：（1）指出文本中的主要論述主題，從大的主題外推出來；（2）將焦點集中於文本中所使用的命名與斷言策略；（3）集中檢視如何合理化這些聲稱的論證(倪炎元，2017)。Wodak本人透過這一組分析策略，處理過包括種族主義、環保主義的倡議者是透過何種策略來合理化他們的理念與主張，這五個論述策略分別是(Wodak, 2001, pp.72 - 73; Reisigl & Wodak, 2009, pp.93 - 94)：

- (1) 指謂／命名策略(referential nomination strategy)：人們如何在語言上被命名或指？
- (2) 謂語修飾策略(predication strategy)：有哪些特質、特徵、成份品質等被歸類於他？
- (3) 論證策略(argumentation strategy)：特定人或社會團體可以循何種論證或論證架構來合理化其對他者的排斥、歧視、壓制？
- (4) 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perspectivation, framing o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strategy)：這些標籤、特徵屬性與論據是循何種角度與觀點加以表達的？
- (5) 強化或淡化策略(intensification, mitigation strategy)：這些宣示或表達是否明顯的相互構連？它們是否有被強化或削弱？

本研究的操作方式，主要是循上述分析策略中所提示的各項問題，直接檢視文本中相關語詞、語句、論證所再現的意涵。

### 參、 研究對象及範圍

基於本研究是對於自由時報在報導 2014 年及 2018 年柯文哲選舉台北市長新聞所持的態度，及柯文哲在競選過程中，各種政治力量與媒體的互動關係等等問題，進行學理的探討及分析。因此，本研究將以媒體文本進行論述分析，解析自由時報對柯文哲選舉相關新聞的評論。此評論包含該報就柯文哲選舉相關新聞

的短評、特稿等文本進行解析，研究其所強調的主軸、框架及採用的論述策略，藉以探究新聞文本的深層意含。同時在研究時間的選擇上，2014年以6月18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決議，確定不提名候選人，全力協助無黨籍的柯文哲，到11月29日選舉投票結束。2018年則以5月30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徵召，提名立委姚文智代表政黨參選台北市長，柯文哲與民進黨正式分道揚鑣，到2018年11月24日選舉投票結束。

本研究的分析是以自由時報的評論進行檢視。主要原因在於報紙做為一種紙本的檔案，完整保存了一時一地的「論述」內容；且台灣報紙評論通常不會避諱其政治立場，反而企圖藉由系統的陳述，向讀者「推銷」這種立場；同時，台灣的報紙在政治議題上，一直有明顯的立場偏好，對選舉新聞更是高度關注。因而透過對報紙評論的檢視，應能相當程度上再現其對議題的立場。選擇自由時報主要其為台灣發行量及閱率的前四大報之一，同時，該報在政治立場上一向鮮明，其創辦人林榮三在經營上就是強調台灣優先，使得其言論一向是偏綠。因此針對自由時報就柯文哲兩次台北市長選舉期間相關新聞中，代表其立場的社論及評論，採取論述分析策略，就其文字語意、修辭操作、意識型態等層面加以分析，可以清楚柯文哲選舉相關新聞是怎麼被建構的。亦即追問在再現柯文哲選舉相關新聞的過程中，媒體怎麼建構或塑造這個政治議題？以嘗試重現自由時報所建構的政治議題以及其所再現的政治論述。同時，也對柯文哲選舉相關新聞運作過程提供政治觀點之外的媒體觀點。

#### **肆、媒體對柯文哲競選市長建構的論述策略**

柯文哲的兩次參加台北市長選舉，由於與民進黨的關係由合作轉變到競爭，自由時報在處理台北市長的選舉新聞，尤其是對柯文哲的報導上有著明顯的不同。

##### **一、2014年的論述策略分析**

在此次選舉中自由時報針對柯文哲的相關論述手法，基本上是以打擊其主要對手，也就是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來助柯文哲贏得選舉，並藉以強化連勝文的弱點來凸顯柯文哲。在分析其論述策略上，可由兩方面進行討論。其一，由批判國民黨及連勝文競選策略打著藍綠對決，來凸顯柯文哲要打一場超越藍綠，重塑公民文化的選戰。其二，由質疑連勝文的財富、強化其靠爸形象來凸顯柯文哲的平民作風企圖扭轉世代的決心。分述如下：

## (一)、柯文哲超越藍綠的文化運動

### 1. 柯文哲在進行一場文化運動

事實上，選戰一開打自由時報就定調國民黨此次是在打一場藍綠對抗的選舉，並以多篇社論及特稿強化其論點。自由時報認為如國安會秘書長高調視察情治單位，或是連勝文提出的公教年終慰問金，就是要藍軍基本盤歸隊；又如連勝文的批評柯文哲心中沒有中華民國，是在操作族群認同議題；而在選情緊繃時，國民黨更提出這場選舉國民黨不能敗，要不就涉及到中華民國的存亡等，都是在操作藍綠、激化藍綠。如連勝文與公民團體套招質疑柯文哲撕毀身分證與墨綠色彩，而且選前更將舉辦捍衛中華民國遊行等，藉以召喚深藍歸隊，在在反映國民黨沒有能力談政見，只想重施統獨對決故技(2014.11.17：A2)。種種的批判就是去比對柯文哲強調，他要打的是一場以「改變政治文化」為訴求的選戰，希望藉由建立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新城市，讓台灣社會脫離藍綠對立的泥淖(2014.11.29：A4)。所以自由時報連著說明柯文哲及連勝文的選舉一個是超越藍綠，一個是藍綠對抗。柯文哲極力擺脫藍綠，呼籲選民看清權貴內在，想要創造新的選舉模式；連勝文則希望柯文哲重新披上民進黨的外衣，塑造藍綠對立，藉由台北市的特殊選民結構，鞏固鐵票贏得勝選(2014.11.12：A4)。因此，對此次的台北市長選舉是代表了兩人之間不同的「理念之爭」，也象徵兩人價值觀不同的「價值之戰」。連激發藍綠對抗，企圖仗基本盤藍大於綠取勝；柯則跨越藍綠，力求翻轉藍綠對抗就如鐵板二塊相撞的舊思維，做全民市長柯文哲現象更是可能翻轉台灣選舉文化的契機(2014.11.10：A4)。更指出，不管他最後是否勝選，那種訴求推倒藍綠之間的高牆，不花大錢與不搞負面文宣，顛倒傳統選舉文化的作法，已經塑造了新的選舉典範。他以素人參選，對決權貴子弟更意味著世代翻轉與價值改變(2014.11.12：A4)。

### 2. 柯文哲面對是一場不公平的對決

針對在選戰期間柯文哲被種種傳言、謾罵、弊案纏身，自由時報的態度是力挺並將期定調為選舉的奧步，更認為國民黨動用國家機器對柯文哲圍剿，已使這場台北市長選戰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破壞了公平競爭的正義。如黨國不僅使出抹黑戰的慣用伎倆，還動員立委脅迫司法帶頭剿柯。馬政府圍剿柯文哲的行動已經不是單純的抹黑，說是「政治追殺」絕不為過。看到國民



黨的黨鞭痛罵必須中立的審計長「混吃等死」，國民黨立委藉由預算之名，把台大醫院院長調到國會「全身掃描」，又要檢察官、廉政署必須立案剿柯，連國稅局都出動調查柯文哲的所有收入單據。假如還有人不分輕重，以「一黨之私」看待，議會政治就快完蛋了(2014.10.08：A5)！

在面對種種不公平的對待，自由時報基本上對次柯文哲的選戰，認為他不僅是超越藍綠，打得更是一場創造新價值的選舉文化。主要在對於種種的不公，柯文哲都能用其柯式風格予以化解。如這次選舉，柯文哲似乎有金鐘罩護體，從 MG149、到墨綠、渾蛋、漢奸、官二、三代、皇民後裔、連家否認柯是救命恩人、器捐等，敵營萬箭齊發，但柯只要使出柯式自嘲，「放輕鬆、深呼吸」就能輕鬆過關(2014.09.12：A10)。並指出，柯文哲把選舉視同一場攸關文化、價值與歷史方向抉擇的社會運動，且強調以先賢蔣渭水醫師為典範；加上募款拒絕「多多益善」、電視辯論不著西裝領帶、以網路「海選」志工、競選歌曲及廣納公民參與…，深具特色的競選模式，為台北與台灣的改變和突破，開啟很大的可能(2014.11.16：A4)。

## (二) 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平民與權貴之爭

在連勝文出線代表國民黨競選台北市以來，其一直就身負著連家的政商關係、財富來源等爭議，而偏偏這是他得以出線的原因，但也成為其最大的包袱。對照著柯文哲是政治素人，完全沒有政商關係，單純的台大醫師出身。自由時報除了如前述，以國民黨對打沒有政黨背景的白色力量外，就是以候選人為主軸，透過不同的論述角度來呈現這場台北市長選舉也是一場平民與權貴之爭。

### 1. 柯文哲是素人是平民

對於連勝文的出身及與政商的關係，是自由時報都批判的主軸，如在財產部分以連家三代致富傳奇，連勝文誇稱自己從不靠爸、白手起家的偉大紀錄，連勝文只敢公布參選當下的財產，卻不敢比照柯文哲把歷年所得來源、海內外繳稅紀錄全部公開，連言必稱「已向監察院申報」的說詞，就永遠無法讓選民釋疑(2014.09.19：A16)。在政界上的權貴形象上，則指有著父祖三代的庇蔭，連勝文具有許多優勢。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他，除了「大明王朝」的馬金團隊之外，其他滿滿的國民黨信眾，都會不吝接受連戰懇切的拜託「銘謝賜票」；至於習近平能影響的台商，那就更不在話下(2014.07.16：A4)。同時在選舉期間發生食安風暴，此時連勝文與魏家的關係，自由時報亦

同樣提出質疑：檢調應該查明。至於遊走於兩岸的連家公子，為何能優先認購康師傅 TDR？與魏家關係如何？也應該向選民說清楚講明白(2014.10.11：A6)。也就是認為連勝文講不清與魏家的關係，所以表示，目前整個大環境也是站在柯文哲這一邊。台灣社會正全面抵制貪心噁心黑心的頂腥集團，魏家二〇〇九年風光回台發行康師傅 TDR，連勝文這個帝寶鄰居立刻「共襄盛舉」，連家與魏家的密切關係是壓倒連勝文選情的最後一根稻草(2014.10.14：A8)？

透過對連勝文的大力批判，就此去彰顯柯文哲的平民作風庶民形象，認為他就是一介政治素人，且柯文哲單操一個，不插旗、不花大錢、不做電視廣告、不靠負面文宣，竟能打敗宣稱祖產「只有兩百坪」的權貴世家，堪稱政治異數(2014.11.16：A4)。並一再的顯示兩人就是各自代表著平民與權貴，柯象徵平民，而連被認為是權貴。柯的公民出陣與連的公子出牌，可以看出改變官宦獨占和想要維繫特權的抗衡。看看簇擁在連周邊的達官顯貴，比較環繞柯的公民力量，就瞭然了(2014.11.26：A6)。

## 2. 柯文哲代表著社會正義及世代正義

也就是指連勝文是代表著舊勢力及權貴勢力，相對的柯文哲就是代表社會正義及世代正義。因柯文哲現象更是可能翻轉台灣選舉文化的契機。不管他最後是否勝選，那種訴求推倒藍綠之間的高牆，不花大錢與不搞負面文宣，顛倒傳統選舉文化的作法，已經塑造了新的選舉典範。他以素人參選，對決權貴子弟更意味著世代翻轉與價值改變(2014.11.29：A4)。因此一再的提出呼籲，台北市選民應該思考，若連勝文當選，是否意味用選票來為「權貴世襲制」背書(2014.09.13：A19)。年輕人不必去思考這些鳥問題，而應想想如何在選戰中終結權貴世襲制，才是正辦(2014.09.13：A19)。這次選舉，多數選民所想的，無非是為自己和後代爭取機會，也就是，社會正義與世代正義(2014.11.22：A2)。

## 二、2018 年的論述策略分析

本研究綜整自由時報在針對柯文哲此次選舉的論述上，大致可分成三個層面。其一是對外，有關中國的兩岸一家親說法；其二對內，與藍綠兩大勢力間的關係；其三是對個人，就其政治性格的批判。分述如下：

### (一)、兩岸一家親與中國唱和之人

在柯文哲2014年選上台北市長成為一顆政治新星後，在2015年3月接受中國媒體訪問及8月18日，台北上海城市論壇在中國上海市瑞金賓館舉行，他提出，秉持「兩岸一家親」精神及「四個互相」（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原則，達到促進交流、增加善意目標，並與上海市長楊雄達成「民間先行，政府支持」共識。

雖期間綠營人士質疑不斷，柯文哲也解釋再三。但隨著選戰開打，這成為自由時報狂打柯文哲的主軸，更認為其與中國大陸同聲唱和。認為柯文哲會說兩岸一家親就是想取代國民黨的中國獨家代理權，因為蔡英文只不過說一句有意願「蔡習會」，柯就卯起來酸人家，好像很害怕代理權落空(2018.6.27:A3)。接著說明，柯文哲的說法中國國台辦也附和嗆聲小英總統「不自量力」，口徑何其一致。只求攀親帶故，期待對方接納為一家人！(2018.6.28:A2)

而對此次的九合一選舉，自由時報也一再的提及外力的介入，並認為柯文哲與中國唱和。在七月即表示，中國因素介入台灣選舉，中國將賭注押在柯文哲身上，柯也樂於「與狼共舞」，彼此拉抬相互幫襯(2018.7.4:A3)。到了在八月更指出，在習近平「兩岸一家親」的加持下，柯文哲遊走於兩岸，許多中國的在台代言人和媒體對他呵護有加，暗中支持，柯也大方回報。因此就以蔡英文總統接授法新社專訪，呼籲國際社會藉由對自由的支持「制約」中國為例，柯文哲反嗆「你力量不夠，跟人家大聲、小聲，只會被人家笑而已。」(2018.8.2:A4)。

在中國大陸與柯文哲的相互幫襯下，自由時報八月二十四的A12版又指出，這個月的十五日，中國中央電視台以兩分半鐘、相當長的時間，專題報導柯文哲連任的策略，該台不但興趣於柯團隊如何將網路上的人氣召喚為實際選票，並且刻意大劃重點：現在對柯文哲更多的關注是他成功選上台北市長之後，是否會在二〇二〇年跳出來，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所以自由時報在同月三十日的A4版即指出，這幾年北京踐踏民進黨綠色政府不遺餘力，卻愛死了自稱「墨綠」的柯P，這道「墨綠」的保護色給了北京黑手伸入台灣操作的空間，一方面將蔡英文逼至牆角，一方面棄吳敦義如敝屣。

而自由時報對柯文哲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更與所謂的台灣的民主價值進行構連，認為柯文哲是背棄了台灣、背棄了民主價值。首先在七月二十三日的A5版指出，現在自命白色、「討厭意識形態」的政客，卻把它美化為「亞洲價值」，反對用意識形態檢驗別人。柯素人既信仰法西斯意識形態，擁抱毛澤東、李光耀、

蔣經國，當然應受質疑與挑戰；他接受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一家親」，屬國家認同問題，比他對政治、社會政策的想法，更應受選民的檢驗。在九月十八日的A5中更強調，柯是無核心價值和中心思想。因許多所謂的中間路線是以獨統為座標的主張，只會讓台灣在國家重建之路更形顛沛而已，是一種投機性政治話術，一種虛假的政治謀略。柯文哲並未追尋真正的城市光榮，他只是利用天龍國已有的優勢、睥睨其他地方，打造某種反叛性的影子讓新新世代跟隨，對尚未真正成功的台灣國家重建有破壞性，甚至讓台灣人民失去民主化，追求主權獨立的信心。因此，在十月二十二日的A6版更痛批，一個自誇智商高的人又發妄語，把台灣貶為川普貨架上的商品，會被川普出賣。他與五毛黨及台灣的中國同路一個鼻孔出氣，看衰川普與台灣，還自命「很有學問」，認為這是「國際現實」。中國和它的同路人不斷鼓譟，要破壞台灣與美國及日本關係，渲染台灣會被美國「出賣」，其實，美國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出賣台灣，反而是接受「一個中國」、「一家親」的叛徒才會出賣台灣。到十一月五日的A4版批判的力道又更加強，南北幹話哥，最混帳的幹話都挑釁選民的紅線。不論民主運動或台獨運動，其核心理念都是對外保主權，對內爭正義；北幹話哥卻喊「一家」親，還去老K貴婦團，濫引華「勒」沙的話，詆毀轉型正義。劈主權和民主神主牌、詆毀地方榮譽，這種幹話哥，背骨失格，不應該是台灣選民的選擇。

## (二)、藍綠惡鬥中的插針之人

此次的台北市長選舉是藍綠白之爭，雖在2014年的選戰中，綠營民進黨沒有推出自家候選人，但立場是支持柯文哲，且柯文哲的政治立場就如他自己所言，是綠色。但他要打著白色力量的口號，希望自己能跳脫藍綠。到了2018年，他在藍綠都推出政黨候選人後，自然更是堅持白色之路。在藍綠惡鬥中，幾件事情的處理，都讓自由時報點出其如何遊走藍綠，甚至藍綠紅，如何借力使力壯大自己。

如以北農風波來說，民進黨如代表綠營，吳音寧在北農是不是代表改革的一方？改革當然會遇到阻力，但是誰藉著這個空間，上下其手、見縫插針，常常是不藍不綠、忽藍忽綠的人，拿著藍綠惡鬥當藉口，挑起惡鬥與口水，不斷混淆視聽，盼外界認清此事(2018.6.13:A18)。並接著指出，台灣的藍綠惡鬥是個事實，選民早已厭倦藍綠惡鬥，柯文哲是不幸中的受益者，非常了解箇中三味。市府整肅吳音寧未遂，侯友宜文大宿舍案惹議，柯P本來可以採取態度處理，但他卻含糊的巧取，爭議都推給藍綠惡鬥(2018.6.28:A2)。因此自由時報認為，當柯需要

綠的票，他就尊蔡；當柯需要藍的票，他就罵蔡。柯左右逢源，唯選票是依，無立場可言（2018.6.27：A3）。人們常覺得他自相矛盾，難以捉摸，一旦從挖選票的角度觀察，就一次全部看懂柯（2018.6.28：A2）。許多人認為柯文哲是一位政治素人，事實上他是一位「怵怵呷三碗公半」的政治精算師，精準掌握民調，披著白袍遊走於藍紅綠之間（2018.6.28：A2）。

政黨政治講求的責任政治，也就是施政成敗政黨需負責任。自由時報即點出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反而是只從中獲利卻不肯負擔責任。自由時報指出，柯文哲的確在市場中找到自我定位。國、民兩黨長期以來在國家路線和能源等政策上歧異太大，民進黨執政後也無意求同存異，一心只想消滅國民黨，人民對「藍綠惡鬥」極度厭惡，尤其是沒有經歷過去年代的年輕人，「超越藍綠」成為年輕人的想像，柯P當然獨領風騷（2018.8.2：A4）。柯P是近年台灣罕見的政治創業家，不管有沒有政績卻引領風潮，他開拓了「無色覺醒」新的政治市場，現有的國民兩黨並沒有比他更特出的人物（2018.8.16：A4）。

但白色力量究竟是什麼？不白藍不綠不紅或又是白又藍又綠又紅？自由時報提出了質疑，因柯文哲在選舉中，在選票的光譜分布範圍，一個候選人可能站在左邊，朝右挖票到中間；也可能站在右邊，朝左挖票到中間；又或者站在中間，向兩邊拓展。另一種是施政乏善可陳，還把弊案打成懸案，既無功績，又失人和，這時就只能透過一張嘴，透過政治話術來挖票，順利時就左右逢源，失利時就顧此失彼（2018.10.31：A4）。所以柯P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當了四年首都市長，不受任何政黨的規範，腦袋裡根本沒有所謂「黨紀」；他對於局處首長，呼之即來，揮之則去，既無提攜之情，更無兄弟之義；他放話攻擊民進黨領袖，一點也不光明磊落，就算被「抓包」，雙手攤，推給藍綠惡鬥，就脫身了（2018.8.30：A4）。最終搶選票，有人用釣的，有人用網的。譬如柯文哲，藍綠橘黃紅，各色選票他都要，開著柯氏漁船，到處拖放流刺網，個人的漁獲（選票）雖然增加，整體的生態卻遭破壞（2018.10.31：A4）。

其實自由時報所指的整體的生態卻遭破壞，就是指民主政治中的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受到破壞。

### （三）、恩將仇報的投機主義之人

翻開柯文哲涉入政治的時間的確不長，但不可否認的，他現在也算佔領了一個山頭。對於柯文哲的崛起，自由時報明白指出，最大的力量，

最重要的恩人就是民進黨。在 5 月 30 日民進黨正式宣布由姚文智代表參選台北市長後，自由時報直接說出，他忘了沒有民進黨，就沒有他這個天龍國市長，把自己當成國民黨，甚至是政治評論者，有時候口徑還接近國台辦，「七傷拳」打久了，滿身病痛，連瘀傷都露出痕跡。卻也承認，柯P雖未加入民進黨，但他是本土陣營培植出來的一號人物，不單純是「政治素人」(2018.8.16：A4)。而面對愈來愈不受控的柯文哲，自由時報認為，柯文哲會越來越大尾，始作俑者當然是民進黨，陳水扁、蔡英文都有份。民進黨提供養分讓這位狂人在綠色的土壤發芽茁壯，都快長成大樹了，都要跨過鄰院了，綠色的養分都快消化光了，民進黨還自認可以牽制柯文哲在台北市。蔡英文們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製造出了一個「政壇酷斯拉」，若還以為憑他們弱弱的力氣就想控制場面，只能說太天真。6.24 柯綠分手前，柯吃定民進黨推不出人選，對於民進黨選前力挺到選後市政協助，不僅毫無感激，甚至恩將仇報，在內部會議多次表達非常討厭民進黨，尤其討厭新潮流(2018.9.13：A4)。

之後，柯文哲的種種作為及言行，自由時報均認為都是其欺騙的手段，本質根本是騙子，並細數著柯文哲的行騙事蹟：記得二〇一四年的台北市長競選期間，柯文哲面對媒體堵麥時老是抓抓頭皮狀似思考，接著像鸚鵡學舌、小和尚唸經般，喃喃背誦「我想是這樣子啦，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是普世價值…」；我們都被他騙了。

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後，什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什麼普世價值，通通不重要了，這時他只想和中國稱兄道弟，要上床和人家「床頭吵，床尾和」了，還要手牽手「兩岸一家親」；我們都被騙了。

明明自己熱臉貼中國，還要裝作無辜狀，又要栽贓嫁禍別人，說什麼「放我一個人去對付阿共仔」；我們都被騙了(2018.7.23：A5)。

更提出柯文哲說過「當超過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上廁所都會關門的時候，兩岸再來談統一」，但現改口「兩岸是床頭吵床尾和」、「兩岸一家親」。更指出當年，柯文哲談到二二八事件時哽咽涕泣，拭淚頻頻，擄獲台派人士的心，柯還說「二二八事件迄今沒有加害者，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他還呼籲「過去的加害者，你們要節制！」

隔沒幾年，他就變臉，說二二紀念日別老是哭哭啼啼，別老是意識形態。從感同身受變身「麻木不仁」，從譴責加害者轉而把世紀冤屈貼上「意識形態」標

籤，怎不教人「心寒」？(2018.9.26：A7)。

對於這次投入台北市長選舉的候選人，自由時報的描述是台北市長選舉，競逐的三位主要候選人，分別是民進黨的姚文智，中國國民黨的丁守中，以及標榜無黨卻形同有派的柯文哲。姚是台派；丁是中國派；柯左顧右盼騎著牆走並逢源取巧，是風派(2018.10.2：A8)。其實自由時報對柯文哲風派的形容，也就是指他的投機，並一連串以數篇評論及以實例證明。

四年前，民進黨禮讓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當時柯說「應以『兩國一制』取代『一國兩制』」，贏得獨派團體力挺。當選市長不到一年，柯就改口說「我一向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精神」，進而踏進上海，獲得中國熱情招待 (2018.6.29：A2)。

柯文哲志並不在首都的城市治理，他的志得意滿在於破壞台灣改變中國國民黨統治後的政治新邏輯，另立山頭。他想一腳踢開原先支持他，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民進黨勢力，以新霸主的姿態引領新新世代展開異於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非常路線，一種非革命性的革命，只凸顯了虛無主義、無建構的反叛，也拉攏對民進黨執政利益分配不滿的人 (2018.9.18：A5)。

他先前說過「承認九二共識就是下跪投降」，後來呢？改說「兩岸是命運共同體」。如果中國共產政權垮了，中國施行民主，「兩岸一家親」有何不可！「兩岸命運共同體」，更是大大的好(2018.11.8：A4)。

但柯文哲有資格喊冤嗎？當年自貼「墨綠」標籤的不就是柯P自己？他自稱墨綠並靠著這張萬用標籤騙到多少選票？一旦市長得手，他就背棄「柯氏初衷」，毫無恥感地把「背叛自我」美化成「我很務實」，也把政黨盟友的用心培力嘲諷為「養虎為患」，從單純醫生變身油條政客，從墨綠到朱紅，墮落之速令人「心驚」(2018.9.26：A7)。

如果牆頭草也能自稱中立，投機者也敢自誇超越藍綠，那我可以告訴你，這絕對是一場世紀大騙局，它就建立在愚者的盲目追隨裡。

問題是，中國一黨專政愈趨集權，習近平走的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帝制」，民主台灣的首都市長俯首歌頌，還親上加親，這不是專門騙票的「騙子」嗎？(2018.10.3：A3)

## 伍、結論

### 一、研究結果

由以上分析，再進一步由Wodak的五個論述策略，分別說明自由時報是如何進行分析。在指調／命名策略上，可明顯的看到自由時報在2014年對柯文哲是以中立性的柯P、無黨籍參選人、政治素人稱之；但2018年對柯文哲是冠以新霸主，想取代國民黨拿到中國的獨家代理權、柯素人、政客等稱謂，甚至是牆頭草、投機者、幹話哥、騙子等負面語稱之。在謂語修飾策略上，2014年是指他是有話直說、光明磊落、真誠之人；但2018年則指出他是為選票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之人，更是不知感恩的恩將仇報之人。在論證策略上，在2014年是指他在進行理念、價值之爭；但2018年則大量的比較柯文哲在各種事件上的前後說法不一致，用以突顯其是言行不一，沒有中心思想的政客。在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上，在2014年是不斷的強化國民黨的激化藍綠來再現柯文哲的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但在2018年則是透過對國家利益、民主價值、台灣主權的利害得失進行剖析，再現其對台灣的傷害。在強化或淡化策略上，在2014年是強化柯文哲在形塑公民文化實現社會正義；但在2018年則是透過種種論述，充分證明柯文哲早已背棄台灣、背棄民主價值、打擊台灣民主，是劈了主權和民主神主牌。

而在自由時報的論述策略下，柯文哲的白色力量，由原本的白中帶綠，現已是不白不綠，反是時而帶藍時而帶紅。

###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這次研究受限於時間及人力，主要是針對 2014 年及 201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單一的媒體自由時報對柯文哲的選舉新聞評論所進行的論述分析。實際上，不同媒體間因其不同的立場，對柯文哲選舉新聞亦有其不同的論述手法，若能進行比較，可更宏觀的分析台灣媒體的選舉新聞論述策略。同時，本次研究亦只針對評論進行分析，若能將相關之新聞、標題、圖表等均列入討論，將可更具全面性的了解自由時報完整的論述分析策略。



## 參考文獻

- 王嵩音 (1998)。台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台北：時英。
- 羅世宏 (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媒介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思平 (2014)。政治新聞與讀者政治立場的建構——以台灣三大本土報紙為例。復興崗學報，104：151-174。
- 林麗雲 (2008)。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183-212。
- 邱宜儀、蘇蘅 (2009)。政治名人與媒體：馬英九報導的新聞框架初探，新聞學研究，99：1-45。
- 徐美苓 (2015)。新興環境議題的媒體建構：以臺灣替代能源新聞報導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32：19-57。
- 倪炎元 (2017)。2014 年台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42：23-57
- Bantimaroundis, P. & Ban, H. (2001). Covering the crisis in Somalia: Framing Choices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In Reese, S.D., et al.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pp.1-37.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Nwabueze, C., & Egbra, S. (2016). Newspaper framing of climate change in Nigeria and Ghana.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15(2), pp.111-124.
- Reta, M. C. (2000). U.S. media coverage of the 1994 elections in South Africa. *Gazette*, 62(6): 523-536.
- Reisigl, M., &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 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pp. 87-121). London: Sage.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 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 M. Meyer(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63–94). London: Sage.

Wolfsfeld, G.(1997). *Media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s from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rom ally to opponent : A comparative study to Liberty Times' s image construction for Ko Wen-je in Taipei Mayor Campaign(2014 and 2018)**

**Yu-Yi Chen<sup>1</sup>**

## **Abstract**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make use of the means of discourse analysis by Ruth Wodak to re.arrange the news article from Liberty Press, and restore the attitude and position of media for the issue of “Taipei Mayor's election” so as to clarify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media role.play of “Taipei Mayor's election” as demonstrated in the “Taipei Mayor's election” politics in Taiwan.

**Keywords** : frame, discursive strategy

---

<sup>1</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 後真相，布里班克人(Buribunks)和對信息性存在的解釋

Kieran Tranter<sup>1</sup>

## 摘要

本文嘗試解釋信息性存在。「信息性存在」係指曾經活著的人物與檔案記錄之間的關係、聯結和可能的真相。本文從德國政治和法律思想家卡爾施密特的一篇鮮為人知的 1918 年短篇小說「布里班克人」(The Buribunks; Die Buribunken) 出發，嘗試對數字中的信息性存在，以及其與真相的關係與其潛在之目的論提出闡述。在施密特的故事中，未來人類不斷出版其個人日記。他們的動機是自戀性的渴望，企盼在後世留下己身之論述。布里班克人似乎生活在一個「後真相世界」中——在那裡存在著對個人信息進行失實陳述、曲解、偽造的可能性，因此必須通過「布里班克國」的紀律和制度安排來加以防範。布里班克人一書提供了一個密碼，可藉此理解他們夢想中的大型檔案館是一個完整信息庫，透過數字收錄信息與個人生活的「真相」相對應並緊密相連。

**關鍵字：**後真相

---

<sup>1</sup> 昆士蘭科技大學法學院技術與未來法教授兼首席。k.tranter@qut.edu.au; 格里菲斯大學法律未來中心高級研究員。本論文曾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中華傳播學會年會中發表。

The digitalis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through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or state surveillance – has triggered an increased awareness of how human doing knowingly and unknowingly generates data and how that data becomes used for corporate and political purposes.(Pasquale, 2015; Zuboff, 2019) Earlier forms of digital engagement were discrete and innocent. The digital was a virtual ‘play space’ where users could create and experiment without much consequence in the real.(Castronova, 2004;2007)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in both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controvers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Wong& Dobson, 2009) have made obvious that distinctions between virtual and the real are misleading because of the datafication of life.(Sadowski, 2019)

This paper begins the task of coming to an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Information existence’ refers to the relation, connection and possibly truth of the lived human and their record in the archive. An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refers to the being of beings thrown into a datafied world. This paper does not yet claim a complete account. Rather it is a step along the way towards understanding how to be as datafied beings having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The guide for this sojourn is unexpected. The paper presents Carl Schmitt’s little known *The Buribunks* as a cypher for conceiving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Carl Schmitt (1888-1985) is often considered a dangerous theorist for contemporary scholars to engage with. Marginalised after the war through his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de-Nazification and coupled with his pre-war engagement with the Nazi regime, Schmitt has loomed as a shadow in legal, political and media theorising.(Müller, 2003) His Weimar works presented to post-war culture a critique of cosmopolitan liberalism through recognition of the irredeemable violence inherent in state politic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its politics of terror, nationalism and naked institutional violence, has resulted in a growing appreciation of Schmitt’s perspective.(Lawson, Bikundo, and Tranter, 2019) Reflecting this renewed interest has been the recent publishi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rl Schmitt*.(Meierhenrich and Simons, eds, 2017) This interest in Schmitt has been

truly global. Ryan Mitchell has recently examined the reception and uses of Schmitt by both Chines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e Buribunks* was one of Schmitt's earliest publication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umma* in 1918.(Schmitt, 2018) *The Buribunks* reads as piece of speculative fiction.(Tranter, 2019) In it, a thirty year old Schmitt discusses the future emergence of a specific posthuman – 'the Buribunks' – humans who have become integrated into a glob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hrough continuous diary writing and dissemination. It is this focus, activity and awareness of the Buribunks as informational entities that renders them cypher through which begin the journey towards an account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briefly, Carl Schmitt's *The Buribunks* as a celebration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as the memorialisation of the self in time. In the second part, drawing upon Schmitt's account of the Buribunks, the various ways that the self becomes recorded in the digital is mapped. However, the present is not Buribunkian, the self and its data-doubles are fragmented and conflicted, generated by surveillance, the data serfdom of worker-nodes, curatorial social media practices and 'dark' activities that try to hid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Nevertheless, the Buribunks drive to master the archive, encapsulates a tendency in the digital towards correspondence and unity within data repositories of the self. Whether this form of total truth is desirable adds significant complexity to current concerns about the politics of truth.

### ***Carl Schmitt's The Buribunks***

*The Buribunks* is a brief text. Written as a celebratory pamphlet for the Buribunks' global ascendancy, it describes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Buribunks, the organisational features of 'Buribunkdom' and the central tenants of the Buribunks manifesto. In terms of genre it is in the form science fiction's 'future history' genre(Canary, 1974); telling the future history of humanity through a parody of academic conventions including the citing of fictions references. Through this the Buribunks emerge as beings infused with a specific technicity; that they are beings (possibly merged with typewriters)(Kennedy,

2014,p44) that practice ‘buribunkology’ – the compulsive keeping a diary of one’s life that is immediately public. (Schmitt, 2019,pp3-4) Further the Buribunks form the Buribunkdom – a total structured repository to which the daily diary is submitted, coded to make searchable and archived(Schmitt, 2019,p13) for ‘History!’ (Schmitt, 2019,p16)

In this future the Buribunkdom dominates the world as the techno-managerial elite. There are seemingly two classes; the Buribunks who write history and do the important jobs of archiving, ordering the archive and studying the archive, and those of inferior intellect who do menial physical activities. (Schmitt, 2019,p15) Indeed, the world as sketched seems reminiscent of Herman Hesse’s *Glass Bead Game* – a world run by the philosopher kings of the global intellectual-bureaucratic class. (Hesse, 2000) It is also tempting to see in *Die Buribunken* an echo of E 2M Forster’s 1909 celebrated short story ‘The Machine Stops.’(Forster, 1909) Forster tells a tale of the possible endurance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outside of the global informatics machine.(Caporaletti, 1997) There is, not unexpectedly, no such sentimentality, or redemption for the liberal human from Schmitt.

Indeed, the informatics machinery of Buribunkdom is described as total:

Every male and female Buribunk is obliged to keep a diary for every second of their existence. Copies of all diary entries are submitted daily and collated by local councils. Their simultaneous inspection results in indexation according to subject matter as well as authorship. Not only are the entries of an erotic, demonic, satirical, political and so on nature grouped together (under the strictest observation of the copyright law pertaining to each entry) but the authors are also catalogued according to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Due to an ingenious scheme, later inspection through a card catalogue makes it possible straight away to determine every circumstance of interest pertaining to each person. (Schmitt, 2019,p13)

After this description of an archive amenable to Boolean searches, the pamphlet elements come to the forefront. What it means, or more precisely what it should mean,

to be a being within this network is emphasised. The self only comes to the present in the act of publishing:

‘I think, therefore I am; I speak, therefore I am; I write, therefore I am; I publish, therefore I am...I write, therefore I am; I am, therefore I write. What do I write? I write myself. Who writes me? I myself write myself. What is the content of my writing? I write that I write myself.’ (Schmitt, 2019,p16)

The essential concern of the publishing, archiving Buribunks is time; precisely the fixing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for future historians. Buribunkdom is dedicated to the managing of the material record of a Buribunk’s life with the desire to stamp that narrative into the future: ‘I am therefore a letter on the typewriter of history.’ (Schmitt, 2019) The enemy of Buribunks, it seems, are biographers and revisionist historians. The Buribunks seems to inhabit a post-post-truth world where the possibility for misinterpre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of from the traces of the self deposited in the archive is countered through total control by a buribunk of their material record.

The pamphlet-like slogans tumble rapidly as the narrator, known only by the initials ‘CS’ (Schmitt, 2019,p19)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this essential essence of the Buribunks. It is not the keeping and disseminating of a diary that goes to the Buribunk essence, rather it is this temporal orientation, a sense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 desire to ‘seek real immortality in history’ (Schmitt, 2019,p18) In celebration, the narrator invokes a hybrid horror composed of time, typewriters and rats. The rat imagery scurries in two directions. The first as an allusion to the cascading of temporal quanta from the future into the past:

...the present is only the midwife who delivers the lively historical past from the dark body of the future. Until it has been reached, the future lies there as dull and indifferent as the keyboard of a typewriter, like a dark rat hole out of which one second after the next enters the light of the past as does one rat after another. (Schmitt, 2019,p16)

The contrast with the Buribunks’ human ancestors cannot be clearer:

Whereas with the mindless human being, millions and billions of rats



stream into the immensity of the past without plan or aim and become lost there – the diary-keeping Buribunk is able to capture them one by one and let their clearly well-arranged army present the big parade of world history. (Schmitt, 2019,p17)

The second direction for the rat imagery is as the lives of individual Buribunk.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individual Buribunk is merely a ‘rat-second’ (Schmitt, 2019) mostly inconsequential to world history. However, concern for self in the real is not a true Buribunken orientation; rather the individual has been subsumed into the flow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We are the letters that have rushed from the hand of the writing World-Spirit and we consciously submit ourselves to this writing power. In this we see true freedom.’ (Schmitt, 2019,p17)

This celebratory conclusion – the last lines are ‘[A Buribunk] is the World-Spirit writing itself, perpetuating itself, outwitting itself in its immediate irrefutable factuality’ (Schmitt, 2019,p19) – is distinctly illiberal. The trappings of the liberal subject, grounded on the fear of death has been extinguished by the ‘sunlight’ (Schmitt, 2019,p17) of the Buribunks. The writing/disseminating units for Buribunckdom are less individuals than their human ancestors, but in their active, ‘heroic’ (Schmitt, 2019,p18) writing, much more. The contrast with the liberal human is highlighted in this relationship to time. A liberal is ‘prudent.’(Hobbes, 2008,p17) He uses its freedom, rights and property in the present to plan, contract and acquire for the future.(Tranter, 2018, pp 71-72) The liberal is future focused; looking ahead to a future self,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present work.(Shum and Tranter, 2017,p485) The Buribunks have a mor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to time. They labour in the present to order their material record so as to dictate to the future. Whereas the liberal looks towards the future, the Buribunks has their typewriter orientated towards the past.

Although typed a century ago, and predates the digital computer by 30 years, in its illiberal celebration, in its temporal awareness, in its comprehension of a total, searchable archive of ‘world-history’, in its funny, irascible explor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the beings networked into such an actuality, *The Buribunks* presents as an iteration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This is what Friedrich Kittler glimpsed in 1991 when he

inserted a substantial extract from *The Buribunks* in his seminal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Kittler, 1999) to connect the material on the typewriter to Alan Turing and the digital. (Kittler, 1999, pp192-260) As a form of informational beings there are some parallels to Donna Haraway's 'Manifesto for Cyborgs.' (Haraway, 1985) Both are ironic, there is a playing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academic conventions and there is a mediation on how technology radically changes the subject, subjectivity and social. Both are illiberal. (Hayles, 2006) This is not to suggest any greater parallels between Haraway and Schmitt; except these aesthetic similarities and a perceived common enemy in the liberal. Whereas Haraway sees the complexities and complicities, along with the possibilities and promises of cyborgs borne from the war-machin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Haraway, 2006), Schmitt's Buribunks are much less transitional. (Braidotti, 2006) There is a confident writing onto world history with the Buribunks that is absent from the cyborg. To paraphrase Schmitt's narrator there is a 'factuality' (Schmitt, 2019, pp17,18,19), a concreteness to the form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denoted by the Buribunks. Whereas the cyborg is an unstable and shifting form, the Buribunks is about unitary identity and the entrenching of that unitary self within the data-stream. The cyborg rejects any absolutes from which a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might be grounded, while the Buribunks labours towards absolutes and correspondence.

It is this deep desire for correspondence, manifest through care of the self's informational record that defines the Buribunks as a form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Having coming to this appreciation of the Buribunks, their relation to the archive will be used in the next part as cypher for living a datafied life in the early twentieth-first century.

### **The Buribunks as a Cypher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There are four transition zones where human life becomes translated into the digital. The first is the digital's emerging system of surveillance that hoovers data from human activity. The second are the institutional expectations of audit culture where work-nodes frantically contribute to the data-stream. The third is through social media

where prosumers actively manage and curat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The fourth is the generating of anonymous data for malevolent 'dark' purposes. The Buribunks can be a way of ordering and making sense of these digital entanglements.

The first transition zone is the unknowing, uncaring or compulsory leaving of data through triggering a surveillance point of the digital. The site of doing by the human is irrelevant. This generating of data can be by walking down a CTV enhanced path, scanning a ticket at a public transport booth, engaging with a GPS or cellular enabled device or actively interacting with the infosphere by googling.(Dodge, 2011) Questions of will and wilfulness are irrelevant. Often depositing data is the cost of participation. This can be as simple as the price of walking or driving in public(Guzik, 2013); that images of self and vehicles will be recorded. It can be as subtle as the unobtrusive recording of search histories by search engines; to the brutal requirement that all fields must be entered with valid data before a transaction can be progressed.

There is a bizarre ghost of liberalism in this unwill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igital. There is often an allusion to 'choice.' To choose to be physically present in public spaces, to choose to search the internet, to choose to engage with online portals to access public and private services, rests with the self. This is the charade of the digital's click to accept end user licence agreement.(King, 2016) Such mythmaking is mischievous. There is a compulsion to engagement. Even assuming an individual managed the troglodyte dream of unplugging from the digital; their movements in the real will still be caught by public surveillance networks. Further, physical disguises such as Guy Fawkes masks or false number plate on vehicles are likely to trigger active investigations. To live life in the present involves the leaving of a data trail that cannot be avoided. The digital has imposed an information tax.

This form of unwitting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is not that of the Buribunks. Yet it is the fact that humans leave historical traces that Schmitt identified as the seed of the Buribunks. The Roman who lost a coin, the Victorian drunk discarding a spirit bottle, the letter back home from a sailor serving during the Pacific war, these haphazard material moments of life can become preserved through time to become the primary sources for history. The digital has merely intensified and magnified this process. Every

second 12.75+ petabytes of data is gathered by the digital's imposition of an information tax.(Domo, 2018) This data is both more permanent and more vulnerable than the coins, bottles and paper left in time stream by earlier humans. It is more permanent as it can be effortlessly copied, backed-up and archived on storage devices. It is more vulnerable as the programs that code and decode that data become updated, replaced and then unsupported; rendering past stored data gibberish.<sup>2</sup> Also storage space costs. Data is archived for a period and then overwritten with newer data. And finally material physicality does affect digital data as it does the passage of coins, bottles and paper within the time stream.(Iraci, 2017) Servers crash, data becomes corrupted and hacked, backups fail. What was once stored can become lost to history; notwithstanding firewalls and backup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digital could experience an informational catastrophe in the magnitude of the fire at Alexandria.(Casey, 2018,p62)

As Schmitt makes plain in *The Buribunks* this shedding of data to history is incidental to humanity. What makes humans lessor to Buribunks was the thoughtlessness and carelessness through which humans allowed these 'rat-second' moments to scurry out of the time hole. Schmitt captures a point that is often overlooked in anxious analyses by liberals of the surveillance apparatus of the digital. In these analysis the digital demarks something radically new – a potential mega-machine of total surveillance – that must be constrained by technologies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safeguarded liberal freedom – rights, property, permission and contract. There is a slippage between the fact that an archive of data is in existence and the ends that those with computation power and access to that archive can achieve. As Schmitt shows it is in the individual becoming self-aware of how their inevit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archive could be used by later analysts that awoke the Buribunks spirit. The liberal anxieties with privacy and the uses of data carelessly disclosed to the digital that crystallised in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controversy in 2018 could be seen as a similar

---

<sup>2</sup> The unreadability of data from the 1970s and 1980s is already being noted as a problem for biographers. See for example José Menéndez, "Loose Fingers Sink Ships—15 Years of E-Mails from Manuel Cardona," in *Manuel Cardona*, ed. Klaus Ensslin and Luis Viña (witzerland: Springer, 2016).

awakening.(Berghel, 2018)

The second transition zone resolves around certain digital manifestations of audit culture. 'Audit culture' is a contested term. It is commonly deploy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and the very Buribunks concern with metrics of academic impact and performance.( Shore and Wright, 1999) In this deployment audit culture refers to analysis of the archive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r worth of an academic publication and by implication the author. However, this specific sit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udit based management does not exhaust the scope of audit culture. As Marilyn Strathern identified 'audit culture' emerged as a framing concept within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capturing how financial and data driven management structures, expectations and protocols were particularly chang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professionals.(Strathern, 2003,pp2-3) The emphasis on rankings, h-indexes and impact factors that are problematis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explores audit culture within the academy is a manifestation of a deeper trajectory withi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Techno-managerial modes of organising and wielding power have been closely tied to practices of the archive: with files, filing and file-notes implementing the practice of leaving records of actions and decision.(Vismann, 2008) Indeed, Reinhard Mehring has suggested that the Buribunks was inspired by Schmitt's wartim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bureaucracy of the Army General Command in Munich.(Mehring, 2014) What is to be recorded and how those recordings become computed to determin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has been a consistent fea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techno-managerial work.(Shore and Wright, 2015,pp423-426) The aggressive accounting for billable hours with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w firm is a pre-audit culture manifestation of this tendency.(Fortney, 2000)

What was identified in the studies of audit culture from the 1990s and early 2000s was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process and an explicit use of data and statistics in the governing ideal.( Shore and Wright, 2015) Anticipated within these studies was the roll-out and remaking of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software.( Wagner, cott, and Galliers, 2006,pp286-288) Enterprise software presents the promise of a single institutional-wide interface, a single data

repository and the automation of auditing activities(Saxena and McDonagh, 2017): the coded embodiment of audit culture.(Petelin, 2008) In practice enterprise software tends towards hierarchy in decision mak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nterprise software works by creating vertical chains of information flow where different users have differential access to the data-stream. As such the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 software has seen the hardening of hierarchy within institutional work environments and with that a predilection to selective disclosure, responsibility pass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offline, analogue ‘shadow systems.’(Skoumpopoulou and Waring, 2017,pp821-825)

Enterprise software is an obvious transition zone in the digital. The worker-nodes of an enterprise software driven organisation operates in a constant presence of workflows notifications, webforms and data-entry. Where the form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being wrought out in bits and bytes by the worker-nodes is different to the data trail shed by humans in the digital is in the sense of self that goes with the depositing. The worker-node knows that the data they upload becomes linked to their corporate identity as a worker-node. Others up the data stream will know that specific worker-node (employee id number xxx) made that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s are made with an awareness that auditing algorithms are already processing that data for employee evaluation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This awareness of contributing to the archive seems more Buribunks. However, this form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lacks specific Buribunks features. First,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e worker-nodes are their own masters; for their data generation and depository is for others. The information serfdom of a worker-node hardwired into an enterprise software system is much more the dystopian existence in Forster’s ‘The Machine Stops’ than the master of the self that is celebrated by the narrator in *The Buribunks*.(Schmitt, 2019,p6) Second, the worker-node enters data not to celebrate their self and life, but rather to comply with the extraneous demands of the system. This is not the writing of reflective life narratives, or marshalling the rat-seconds of a life into an unassailable memorial for history. Ashley Pearson and Kieran Tranter have used the platform video game genre, epitomised by Nintendo’s Super Mario Bros. franchise, to describe the worker-node in

the digital.( Pearson and Tranter, 2015) There is a consistent flow of instant tasks to be navigated. If the task is not completed it restarts. A timer counts down how long is being spent on a task. And the rigidity of code means that there can only be set number of structured resolutions to that task.( Pearson and Tranter, 2015,pp 831-833) At this transition zone the human occupying the site of a worker-node is aware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archive but is mostly lost in a frenzy of responding to digital stimulation. Rather than being a Buribunks ordering the rat-seconds, they are the rats being organised by the master code.

Which comes to the third transition zone of the digital, the beings manifested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disclosed through social media seems to have distinctly Buribunks featur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edia involves the conscience addition to the archive; unlike the human triggering a surveillance point. Further it involves the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details of the self to the archive(Dijck, 2013,pp29-44), not the compulsory workflow production of a worker-node. Research on social media has ten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oncerns social media as *media*. In this research social media is identified as a specific form of mass or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re tends to be a binary assessment of social media within this literature. The first is on its possibility to enhance public life; through better communication in disaster management(Houston, 2011) or for greater form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Linders, 2013) or as a forum for progress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like the ‘#metoo movement’(Tippett, 2018) or the Arab spring of the early 2010s.( Howard et al, 2011) Balanced against this enhancing of the public potential and actuality of social media, is research that identifies its corrosive effects on public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how social media echo chambers have contributed to a fake news fuelled divisive and aggressive political culture(Sunstein, 2018) or undermines the jury system.(Braun, 2017) Liber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pparatuses tends to be the focus of this literature, exploring as had happened with older media forms, how technolog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enhance and undermine individual freedom of choice and action.(Siapera, 2017,pp39-59)

The second focus is more on the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brought to being by social

media; specifically the *social* in social media. This literature shares a symmetry with the other focus in that there are contrasting assessments of the social of social media. The first is that social media by providing an informational avatar, enriches the self through providing meaningful and beneficial social interactions.(Chambers, 2013) There have been claims that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 can provide for greater public diversity and personal empowerment(Poletti, 2011) and contribute to positive mental health outcomes.( Ellison, Steinfield and Lampe, 2007) However, these claims are contested(Sidani et al, 2016) with recent studies suggesting that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has negative mental health effects.(Hawi and Samaha, 2017)

The identified reason that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has negative health effects relates to the curatorial nature of social media content.(Hogan, 2010) Prosumers of social media do not treat it as a confessional space where the rawness of life is recorded in its factuality.( Tifentale and Manovich, 2015) Rather there is increased awareness that social media users craft a specific image of the self in the text, images and likes within an account.( Kang and Wei, 2019) This drive to present details of the self within an overarching narrative is distinctly Buribunks. It is not the base recording of a chronology of events that distinguishes the Buribunks but an awareness of how events are interpreted by others further down the time-stream and a desire to dictate meaning to the later. Mikaela Pitcan, Alice E Marwick and danah boyd report how young New Yorkers from non-white backgrounds carefully manage their online presence according to mainstream notions of respectability.(Pitcan, Marwick, and boyd, 2018)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a Buribunks awareness to ‘self-censor... in a manner they described as presenting a “neutral” or “vanilla” face, catering to the respectability norms of the most powerful potential viewers—often potential employers or high-status community members—rather than peers.’(Pitcan, Marwick and boyd, 2018) The participants show that the Buribunks-like activity of crafting digit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tends to be around socially conservative narratives of mainstream respectability, material success and personal health and happiness.( Dobson, 2016) This is not correspondence truth but a post-truth project of self-positioning according to underlying narratives and framing. Social media content generally shows happy,



healthy successfulness.(Lambert, 2016) This is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the negativ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consumption. There is an over representation of ‘perfect’ people with ‘perfect’ bodies living ‘perfect’ lives. This curating results in the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disclosed on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s often having a highly selective and tenuous relationship to the complex, contested everydayness of a human life.

The post-truth, curating social media prosumer is not entirely Buribunkean. The Buribunks compulsorily recorded the minutia of daily existence. Selective withholding in the name of curating seems to be not allowed. Rather than doctoring and selective disclosure, the Buribunks were encouraged to write about why and how they desired to doctor and selectively disclose. This was embodied in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a diary about not wanting to keep a diary. '(Schmitt, 1985,p14) The Buribunks manifested a principle of stric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ived reality and the material record that is not evident in the practices of social media prosumers. Nevertheless, the Buribunks features of the social media prosumer are telling. There is a distinct illiberalness to the nature of their disclosing. The liberal divis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liced by rights, property and contract, has been transcended. There is a confident writing oneself, or at least a curated avatar of the self, into the digital.

There is a tempting sense of informational sovereignty disclosed by the Buribunkean activity of the social media prosumer. Informational sovereignty tends to be spoken about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nation state terms as the need for nations to have a sovereignty over their data.(Polčák and Svantesson, 2019) It is suggestive to interrogate the curatorial activities of a social media prosumer in sovereign terms familiar from Schmitt's later work. The diligent social media prosumers polices the informatics of the cultivated digital self. There is an everyday managing – the posting of content and the network labouring of liking – and a more extreme set of ‘exceptional’(Schmitt, 1985,p5) actions around the suspending and deleting of accounts. Further, deeply embedded in the network generative logic of social media is another familiar concept; the friend/enemy distinction.(Schwab, 1996,p26) There is a brutal logic embedded in the decision to link with ‘friends’ or not-linking with ‘not-

friends'. In positioning the prosumer as the loci for everyday data management, more extreme exceptional activities and couching the networking switch according to 'friends' and 'not-friends' there are allusions to Schmitt's sovereign.

However, in this the limits of *Die Buribunken* as a cypher for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is revealed. The human unwittingly and carelessly shedding data to the digital, the worker-node responding to the digital stimuli of the master-code and the social media prosumer can all be the same self. Indeed, could be the same self at almost the same time. It is a fundamental percept for Schmitt that the sovereign is a unity. Sovereignty is not capable of division and signs of splintering and contestation are terminal symptoms.(Schwab and Hilfstein, 1996,p74) The Buribunks with their confident management of the rat-seconds of the present for the memorialisation of the self are similarly unified. Schmitt's characters impose a singular imprint onto the world. This is not the reality for the data-doubles spawned by the same human when encountering transitional points in the digital. There are shifting and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the self. The imprint of the self through digital surveillance might only have a lo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ata-flows emanating from the same self as a work-node or the avatar of the self that is strutting about social media. There is a nomadic form(Braidotti, 2017,p78) to the transient, changing and conflicting traces of the self in the digital.

This is before a fourth transitional point to the digital is introduced; that of false accounts and trolling. The Buribunks through the diary 'stabilised [fame] into a solid state.'(Schmitt, 2019,p18) The users of a false account and trolls seeks personal pleasure through causing anonymous harm.( Buckels,Trapnell,and Paulhus, 2016) While the social media prosumer presents an avatar of the self to the digital, the users of false accounts and trolls have a distinct un-Buribunks desire to hide from history, to radically disconnect and quarantine their lived self from the record of their digital activities. With these contributors to the digital the narcissism manifest in the Buribunks is replaced by darker motivations.(Humphrey, 2017) Any relation to a Buribunk is in the negative. There is no archiving of the self to history, rather, as seen directly in the trolling of Facebook memorial sites(Phillips, 2011), there is antagonism

towards other disclosures of self in the digital. Trolls are not liberals prudently striving in the present for a better future, nor are they Buribunks compulsively diarising in the present so the future archive records their past. Rather the troll is present gratification; indifferent to the record being left behind.

The existence of false accounts, trolls and even the 'dark web' of hidden identities(Gehl, 2016,pp1225-1226) highlights that some data in the digital is purposively disconnected to a human life in the real. This reinforces the disunity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in the digital; that coherence and correspondence is not, currently, possible. For all the spin around 'big data' the reality is big data is yet to be that big – yet to be a merged totality. However, the f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e Buribunks* rests in its suggestive teleology. Buribunkdom was created through an impulse to care for the record of a self in the archive. The text highlights that the incongruence between a unitary sense of self in the real and the disunity the self's digital representations generates a desire for digital unification. This process can be glimpsed in the liberal reforms around regulating digital surveillance through permissions and implementing rights to forget. It can also been seen in the name-and-shame actions of troll hunters in connecting anonymous offensive and damaging digital activity to real persons.(Humphrey, 2017) For the tradition that takes Haraway's cyborg as its progenitor such drifting back to unity is possibly regressive. In the splintering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in the digital, a transitional, and possibly a more ethically responsive being was capable of growing, away from the old totalities of self, body, gender, sex, race, class, biota.(Braidotti, 2006,pp77-79) There is a terrifying sameness to the Buribunks. A world composed of narcissists banging out self-aggregating platitudes on the typewriter of history that could be coming to pass with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cat memes, GIFs, selfies and ritualised emoji posts in social media. The Buirbunks laboured for unity and mastery of self through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a total, authoritative archive. This seems to capture the motives and drives behind attempts to achieve greater digital correspondence to the real and unific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in the digital. The danger of this is the energy for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elf, and particularly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s that

comes from playing, experimenting and fragmenting expected unitary identities could be lost.( Lyons, 2018,p835) A future of bland, ever-archiving persons in the real, reflected in bland, safe and curated representations in the digital, should not be celebrated.

## References

- Allcott, Hunt, and Matthew Gentzkow.(2017).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2),211-36.
- Andreassen, Cecilie Schou, Ståle Pallesen, and Mark D Griffiths.(2017).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dictive Use of Social Media,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Findings from a Large National Survey.*Addictive Behaviors*,64, 287-93.
- Bararova, Natalyn N, and Yoon Hyung Choi.(2014).Self-Disclosure in Social Media: Extending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Disclosure Motiv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4(4), 569-784.
- Berghel, Hal.(2018).Malice Domestic: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Dystopia.Computer, 5,84-89.
- Braidotti, Rosi.(2016).*Transpositions: On Nomadic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aun, Kerstin.(2017).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 the Fate of the Australian Jury System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ependenc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40(4),1634-62.
- Buckels, Erin E, Paul D Trapnell, and Delroy L Paulhus.(2014).Trolls Just Want to Have Fu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67,97-102.
- Canary, Robert H.(1974).Science Fiction as Fictive History.*Extrapolation*,16(1), 81-95.
- Caporaletti, Silvana.(1997).Science as Nightmare:'The Machine Stops' by Em Forster. *Utopian Studies*, 8(2), 32-47.
- Casey, Eric.(2014).Collecting the Cosmos: The Apocalypse of the Ancient Library.” In *The End That Does: Art, Science and Millennial Accomplishment*, edited by Cathy Gutierrez and Hillel Schwartz, 41-83. Abingdon: Routledge.
- Castronova, Edward.(2007).*Exodus to the Virtual World: How Online Fun Is Changing Real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 “The Right to Play.” *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 49 (2004): 185-210.
- Chambers, Deborah. *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line Intimacies and Networked Friendship*.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Cornejo, Raymundo, Mónica Tentori, and Jesús Favela.(2013).Enriching in-Person Encounters through Social Media: A Study on Family Connectedness for the Elder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71(9), 889-99.
- Dobson, Amy Shields.(2016). *Postfeminist Digital Cultures: Femininity, Social Media, and Self-Represent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ata Never Sleeps 6.0. “2018, accessed 22 January, 2019, <https://www.domo.com/learn/data-never-sleeps-6>.
- Duffy, Brooke Erin, and Ngai Keung Chan.(2019).You Never Really Know Who’s Looking: Imagined Surveillanc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New Media & Society*, 21(1),119-38.
- Duguay, Stefanie.(2016).He Has a Way Gaye Facebook Than I Do”: Investigating Sexual Identity Disclosure and Context Collapse on a Social Networking Site.” *New Media & Society*,18(6),891-907.
- Dynel, Marta.(2016).Trolling Is Not Stupid: Internet Trolling as the Art of Deception Serving Entertainment.*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13(3),353-81.
- Ellison, Nicole B, Charles Steinfield, and Cliff Lampe.(2007).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2(4), 1143-68.
- Forster, E M.(1909).The Machine Stops.In *The Machine Stops and Other Stories*, edited by Rod Mengham.London: Andre Deutsch, 87-118.
- Fortney, Susan Saab.(2000).Soul for Sa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Associate Aatisfaction, Law Firm Culture, and the Effects of Billable Hour Requirements. *UMKC Law Review*, 69(2) (2000).
- Fox, Jess, and Margaret C Rooney.(2015).The Dark Triad and 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 as Predictors of Men’s Use and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76,161-65.
- Gehl, Robert W.(2016).Power/Freedom on the Dark Web: 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the Dark Web Social Network. *New Media & Society*, 18(7),1219-35.

- Guzik, Keith. (2013). Taking Hold of the Wheel: Automobility, Social Order, and the Law in Mexico's Public Registry of Vehicles (Repuve)."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7(3), 523-54.
- Haraway, Donna. (1982).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65-107.
- Hawi, Nazir S, and Maya Samaha. (2017). Th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5(5), 576-86. <https://doi.org/DOI 0894439316660340>.
- Hayles, N Katherine. (2006).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3(7-8), 159-66.
- Hesse, Hermann. (2000). *The Glass Bead Game*. Translated by Richard Winston and Clara Winston. London: Vintage Classics, 1943.
- Hobbes, Thomas. (2008). *Leviathan*.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1651.
- Hogan, Bernie.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30(6), 377-86.
- Hooghe, Marc, and Jennifer Oser. (2015). Internet, Televis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e Effect of 'Screen Time' on Social Capi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8(10), 1175-99.
- Houston, J Brian, Joshua Hawthorne, Mildred F Perreault, Eun Hae Park, Marlo Goldstein Hode, Michael R Halliwell, Sarah E Turner McGowen, et al. (2015). Social Media and Disasters: A Functional Framework for Social Media Use in Disaster Planning, Response, and Research. *Disasters*, 39(1), 1-22.
- Howard, Philip N, Aiden Duffy, Deen Freelon, Muzammil Hussain, Will Mari, and Marwa Mazaid. (2011). *Opening Closed Regimes: What Wa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Arab Spring*. Seattle: Projec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Humphrey, Michael Lee. (2017) I Am in No Way This': Troll Hunters and Pragmatic Digital Self-Reference." *Persona Studies*, 3(2), 21-34.

- Iraci, Joe.(2017).The Soaking Resistance of Electronic Storage Media. *Restaur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brary Archival Material*, 38(1),33-75.
- Kang, Jin, and Lewen Wei.(2019).Let Me Be at My Funniest: Instagram Users' Motivations for Using Finsta (Aka, Fake Instagram).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https://doi.org/doi.org/10.1016/j.soscij.2018.12.005>.
- Kennedy, Ellen.(2004).*Constitutional Failure: Carl Schmitt in Weim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Chelsea.(2016).Forcing Players to Walk the Plank: Why End User Licences Agreements Improperly Control Players' Rights Regarding Microtransactions in Video Games.*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58(4),1365-402.
- Kitchin, Rob, and Martin Dodge.(2011).*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Kittler, Friedrich A.(1987-1999).*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uchael Wutz.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mbert, A.(2016).Intimacy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cebook: Beyond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Media & Society*, 18,2559-2575.
- Lawson, Charles, Edwin Bikundo, and Kieran Tranter.(2019).The Perils of Parliamentarism: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s.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https://doi.org/DOI:10.1093/ojls/gqy040>.
- Lăzăroiu, George, Zuzana Rowland, and Viera Bartosova.(2018).Gendered Power Disparities, Misogynist Violence, and Women's Oppression: The #Metoo Movement against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Social Justice*, 10(2).
- Lim, Merlyna.(2017).Freedom to Hate: Social Media, Algorithmic Enclaves, and the Rise of Tribal Nationalism in Indonesi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9(3),411-27.



- Linders, Dennis.(2012).From E-Government to We-Government: Defining a Typology for Citizen Co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9(4), 446-54.
- Lyons, David.(2018).Engagement, Exposure, and Ethics in Digital Moder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821-42.
- . “Surveillance, Power and Everyday Life: Properties of Technology.” In *Emerging Digital Spac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dited by Phillip Kalantzis-Cope and Karim Gherab-Martín, 107-2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Mehring, Reinhard. (2017).*Carl Schmitt: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 Meierhenrich, Jens, and Oliver Simon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rl Schmi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éndez, José.(2016).Loose Fingers Sink Ships—15 Years of E-Mails from Manuel Cardona.” In *Manuel Cardona*, edited by Klaus Ensslin and Luis Viña, 87-92. witzerland: Springer.
- Mitchell, Ryan.(2019).The Decision for Order: Chinese Receptions of Carl Schmitt since 1929.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orrison, Aimée.(2011).Suffused by Feeling and Affect: The Intimate Public of Personal Mommy Blogging.*Biography*,37-55.
- Müller, Jan-Werner.(2003). *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liveira, Gustavo Henrique Maultasch, and Eric W Welch. (2013). Social Media Use in Local Government: Linkage of Technology, Task,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0(4),397-405.
- Page, Ruth.(2011).*Stories and Social Media: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Pasquale, Frank.(2015).*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arson, Ashely, and Kieran Tranter.(2015).Code, Nintendo’s Super Mario and Digital Leg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28(4), 825-42. <https://doi.org/10.1007/s11196-015-9417-x>.
- Petelin, George.(2008).Can We Trust Our Ground Control?.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1.
- Phillips, Whitney.(2011). Loling at Tragedy: Facebook Trolls, Memorial Pages and Resistance to Grief Online. *First Monday*, 16(12).
- Pitcan, Mikaela, Alice E Marwick, and danah boyd.(2018).Performing a Vanilla Self: Respectability Politic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gital World.”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3(3),163-79.
- Polčák, Radim, and Dan Jerker B Svantesson.(2017). *Information Sovereignty: Data Privacy, Sovereign Powers and the Rule of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Poletti, Anna.(2011).Coaxing an Intimate Public: Life Narrative in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inuum*, 25(1),73-83.
- Quandt, Thorsten.(2007).Dark Participation.” *Media Communication* 6, no. 4 (2018): 36-48.
- Roberts, PeterEducation.(2007).Conscientisation in Castalia: A Freirean Reading of Hermann Hesse’s the Glass Bead Gam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6(6),509-23.
- Sadowski, Jathan.(2019).When Data Is Capital: Datafication, Accumulation, and Extraction. *Big Data Society*, 6(1).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18820549>.
- Saxena, Deepak, and Joe McDonagh.(2017).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nterprise Systems Research in Leading Is Journals (2000-201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Midwest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Conference 2017, Springfield, Illinois May 18-19, 2017.
- Schmitt, Carl.(2019).The Buribunken. *Griffith Law Review* 28 (2019) forthcoming.
- .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 “Die Buribunken.” *Summa: Eine Vierteljahresschrift Viertes Viertel* 1, no. 4 (1918): 89-105.

- . *The Leviathan in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6.
- .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5.
- Seabury, Marcia Bundy.(1997).Images of a Networked Society: Em Forster's" the Machine Stops.*Studies in Short Fiction*,34(1), 61-71.
- Shore, Cris, and Susan Wright.(1999).Audit Culture and Anthropology: Neo-Liberalism in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557-75.
- . "Audit Culture Revisited: Rankings, Ratings, and the Reassembling of Socie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6, no. 3 (2015): 421-43.
- . "Governing by Numbers: Audit Culture, Ranking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ocial Anthropology* 23, no. 1 (2015): 22-28.
- Shum, Annie, and Kieran Tranter.(2017).Seeing, Moving, Catching, Accumulating: *Pokémon Go*, and the Legal Sub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30(3),477-76. <https://doi.org/10.1007/s11196-017-9519-8>.
- Siapera, Eugenia.(2017).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2nd ed. London: Sage.
- Sidani, Jaime E, Ariel Shensa, Ana Radovic, Elizabeth Miller, Jason B Colditz, Beth L Hoffman, Leila M Giles, and Brian A Primack.(2016).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Depression among Us Young Adult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3(4), 323-31.
- Skoumpopoulou, Dimitra, and Teresa Waring.(2017).Cultural Chang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nterprise System: A Uk University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0(5),809-30.
- Southerton, Clare, Maja Sonne Damkjaer, and Anders Albrechtslund.(2019). Living Big Data: Datafication in Everyday Practices of 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ig Data and the Power of Narrative, Copenhagen.

- Strathern, Marilyn.(2003).Introduction: New Accountabilities.” In *Audit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 Ethics, and the Academy*, edited by Marilyn Strathern, London: Routledge,1-18.
- Sunstein, Cass R.(2018).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fentale, Alise, and Lev Manovich.(2015).Selfiecity: Exploring Photography and Self-Fashioning in Social Media. In *Postdigital Aesthetics: Art, Computation and Design*, edited by David M Berry and Michael Dieter.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09-22.
- Tippett, Elizabeth Chika.(2018).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Metoo Movement.” *Minnesota Law Review*. 103(1),229-302.
- Tranter, Kieran.(2019).Die Buribunken as Science Fiction: The Self and Informational Existence.*Griffith Law Review*, 28: forthcoming.
- . *Living in Technical Legality: Science Fiction and Law as Techn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2018.
- Trottier, Daniel.(2012).*Social Media as Surveillance: Rethinking Visibility in a Converging World*. Farnham: Ashgate.
- Van Dijck, José.(2013).*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smann, Cornelia.(2008).*Files: Law and Media Tech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gner, Erica L, Susan V Scott, and Robert D Galliers.(2006). The Creation of ‘Best Practice’ Software: Myth, Reality and Ethics.*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16(3),251-75.
- Ward, Ken.(2018).Social Network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Kantian Ethics: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o Cambridge Analytica’s Behavioral Microtargeting.” *Journal of Media Ethics*,33(3),133-48.
- West, Robin.(1988).Jurisprudence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5(1),1-72.

- Wong, Karen Li Xan, and Amy Shields Dobson.(2019).We're Just Data: Exploring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in Relation to Digital Platform Ratings Cultures in Westernised Democracies. *Global Media and China*,4(2),220-32.
- Woods, Heather Cleland, and Holly Scott.(2016). # Sleepyteens: Social Media Use in Adolescence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Sleep Quality, Anxiety, Depression and Low Self-Esteem." *Journal of Adolescence*, 51,41-49.
- Wright, Susan, and Cris Shore.(2003).Coercive Accountability: The Rise of Audit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udit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 Ethics, and the Academy*, edited by Marilyn Strathern, London: Routledge,69-101.
- Yates, Dave, and Scott Paquette.(2011).Emergency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ocial Media Technologies: A Case Study of the 2010 Haitian Earthquak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1(1), 6-13.
- Zuboff, Shoshana.(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London: Profile Books.

# Post-Truth, *Buribunks* and Towards an Account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Kieran Tranter<sup>1</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work towards an account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Information existence’ refers to the relation, connection and possibly truth of the lived human and their record in the archive. Drawing upon a little known 1918 short story by the German political and legal thinker Carl Schmitt *The Buribunks (Die Buribunken)*, this paper presents a tentative account of information existence in the digital, its relation to truth and its potential teleology. In *The Buribunks* the future of humanity that Schmitt describes is of individuals continuously publishing their personal diary motivated by a narcissistic desire to set the narrative of the self for the future. The Buribunks appear to inhabit a ‘post-post-truth world’; whe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misrepresentation, misinterpretation and fal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an individual was possible and must be guarded against through the disciplin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Buribunkdom. The Buribunks provide a cypher through which to consider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in the digital. Foremost the Buribunks desire total correspondence. They dream the mega-archive, a complete repository of information that corresponds and coheres to the ‘truth’ of an individual’s life.

**Keywords:** post-truth

---

<sup>1</sup> Professor and Chair Law, Technology and Future, School of Law,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k.tranter@qut.edu.au](mailto:k.tranter@qut.edu.au); Senior Research Fellow, Law Future Centre, Griffith University. A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Conference 27 June 2019 Ming Chuang University, Taiwan. The presentation and this paper is based on ‘*Die Buribunken* as Science Fiction: The Self and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2019) 28 *Griffith Law Review* forthcomi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Edwin Bikundo, Frank Pasquale and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conference for suggestions and guidance. All errors and omissions are my own.

# 銘傳大學 傳播學院

## 《傳播管理學刊》 徵稿啟事

《傳播管理學刊》為傳播學院之學術刊物。本刊鼓勵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精神，探討傳播管理相關議題，本期刊為一年二期刊，每年 6 月及 12 月出版。

### 壹、本刊內容

一、徵稿範圍：傳播管理領域之研究、理論、方法、實務分析、評論等各類學術論著，凡未發表或出版於國內外期刊，並符合本刊主題之研究論文均歡迎投稿。

二、本刊主題：

- (一)媒體產業相關議題
- (二)傳播生態相關議題
- (三)數位產業相關議題
- (四)國際傳播相關議題
- (五)整合行銷傳播相關議題
- (六)其他傳播管理相關議題

### 貳、審查制度

一、審稿及刊登：本刊設有審查制度，所有稿件均經編輯委員會送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審查通過後刊印，經錄用之稿件，不發放稿費，本學刊登載之論文，版權歸本院所有，唯文責由作者自負。

二、來稿之評審由編輯委員及傳播管理相關研究領域學者擔任。

三、送審稿件均需匿名，由兩位專家學者進行匿名審查；每位評審於評審意見上陳述意見，並於下述四項勾選其中一項：

- (一)不必修改，直接刊登。
- (二)略加修改(敬請說明建議)。
- (三)大幅修改(敬請說明建議)。
- (四)退稿(敬請說明建議)。

四、編輯委員會得就第三位評審之意見，決定是否刊登或退稿。

五、是否刊登文件，事關投稿人權益，應將評審意見等函送投稿人，說明處理方式。

## 六、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略加修改	大幅修改	退稿
第一位 評審意見	刊登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略加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大幅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退稿	退稿
	退稿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退稿	退稿

## 參、投稿須知

### 一、來稿應注意事項：

(一)來稿內文可用中、英文寫作，皆須附中、英文摘要。

(二)來稿請備紙本一式三份(包括封面頁、標題、摘要、關鍵字、正文、圖表及參考文獻)，以及 Word 電子檔一份。寄至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管理學刊》編輯委員會收。

二、每篇論文長度約一萬字以內。

三、語文：中、英文均可，唯英文稿須附中文題目及摘要。

四、本刊對撰寫格式擁有修改之權利，以保持編輯水準。

五、截稿日期：文稿審查(包括初審、作者修改、複審)約需三至四個月，文稿之截稿日期為該期出刊前四個月。例如：六月出刊之文稿，其截稿日期為二月底。

### 肆、稿件格式

本刊為統一文稿 APA 格式，編訂撰稿體例，來稿須合本刊徵稿格式，以便本刊作業。稿件格式請參照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管理學刊》網頁 <http://host.mcu.edu.tw/mol/data/1419926649.pdf>。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Vol.20 No.2 December 2019

---

- The Control of Television Media by the Putin's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of Patriotic Propaganda
- From all to opponent : A comparative study to Liberty Times' s  
image construction for Ko Wen-Je in Taipei Mayor  
Campaign(2014 and 2018)
- Post-Truth, *Buribunks* and Towards an Account of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Published b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ISSN 1993-6516